

第六集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 目 錄

立法院院長人員就職典禮答詞·····	一
怎樣做到以黨治國與何以要完成地方自治·····	七
怎樣去求得我們的自由·····	二五
平均地權的真義及土地法原則的來源·····	三五
每個黨員要認真檢點過去一年中的錯誤·····	四五
慶祝聲中黨員應有的覺悟·····	六一
立法院的各委員會應該怎樣努力·····	六五
裁兵是求國家有力立法是求訓政有猷·····	七三
有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	八五

最近外交上面的兩個要聞·····	一〇一
爲黨服務的人絕不應有權利思想·····	一〇九
貫徹始終以求實現·····	一一七
黨外無政政外無黨·····	一二三
完全廢除陰曆是總理的遺教·····	一三七

## 立法院院長人員就職典禮答詞

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在國民政府

遵守黨義，服從黨命，是立法院同人應該深切注意的——我國從前不建憲立法的兩個原因——今後立法的標準，要根據 總理的遺教，參考已往的歷史，斟酌今後的國情——就對內對外各方面看來，立法一層，今後都感覺十分需要——今後立法的嚴與速——立法委員惟有一德一心，不容有任何派別的分歧。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今天立法院成立，承中央代表，國府主席，很懇摯的致訓，漢民謹代表立法院全體就職同人，竭誠領受，並表示感謝。同人等從此當恪遵 總理遺教，奉公守法，努力工作，以不負政府的委託，及今天諸位的盛意。

竊意現在政府的五院組織，是根據的 總理五權憲法的精神。五權憲法，是、總理的創作，為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行，訓政時期的五院組織，和 總理所定憲政時期的，並不相同。訓政時期是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人民的政權，而以治權付之

國民政府。立法院既爲國民政府所屬的機關，同受黨的付託，而行使治權，一切當然要遵守黨的意旨，服從黨的命令，這是同人等今後一定深切注意的一點。

我國從前的政府，不很注重立法的事情。這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由於我國從前是專制國家，君主的權威至高無上，往往一人的意旨，可以變更一切，雖然有法，常常不能盡其效用，大家便不會覺得立法機能之重要了。第二，由於我國人凡事都好因襲既往，所以歷代的法律，一貫相承的多，很少有時代精神，而出於新創的。其實立法這件事，除參酌歷史的事實以外，還須顧及時代的情形，斟酌損益，以求適應社會的需要。我國嚮來立法都不如此，因而固有的法律總不能有甚麼效用，而創立新法一件事，依然不爲人所注重，實在不對得很。自從 總理主張以三民主義建國，五權憲法治國以來，立法更成爲極重要的事情，而大家也都感覺立法的十分需要了。不過在目前已經感覺立法的需要之中，我們仍應知道：要鞏固國家的基礎，誠然如中央代表剛才所說，必先確立合於國家人民所需要的大法，使一切措施，都有所依據。而主席殷殷以根據 總理的遺教，參考我國已往的歷史，和斟酌今後的國

情，去確定今後立法的標準，這確乎是不刊之論，漢民應率本院同人，共同勉力於此。

說到立法的需要一層，現在革命事業既已由軍政而到訓政，各種法律的製定當然也就一天迫切過一天。就目前的情形看來，對內對外，立法院確有趕速成立，加緊工作的必要。

總理一生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遺囑上也言之諄諄。大家同志既秉承 總理的遺志，繼續 總理未竟的工作，對外便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如撤消領事裁判權等，都是我們政府今後亟應趕辦的要務。但是我國法律的不完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民法簡直沒有；商法雖有一部分而支離破碎，不適用於用；至於其他法律，更缺而不全。一旦不平等條約廢除以後，自家所有的法律不足以應付事實，事後固將遺譏世人，事前也不足以得外人的信任，即大足以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阻撓。再就對內說：目前人民最大的要求是生活安定，我們要使人民生活安定，必須使他們的生命財產受法律的保障，解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的痛苦，然後他們才能安心從事於生產的事業。剛才中央代表說：『訓政時期最大的責任，是把紛亂的國家，弄得安定整飭，然後才好有一天能將政權交還人民，而達到憲政時期』。要國

家安定整飭，其道爲何？應無過於訂定法律，使人民都有行動的軌範了。再則 總理在建國大綱上很鄭重的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又說：『我是爲民生主義而革命的』。我們都知道 總理的民生主義有兩個最大的原則：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我們要奉行 總理的這兩個原則，土地法，勞動法等等，又何能不從速製定呢？所以從各方面看來，立法院事業的急需，責任的重大，更無待言。在這種情形之下，同人等敢不益加奮勉，以免阻越！主席對政務人員的服務，向來主張『嚴速』兩字，個人極抱同情。在立法上『速』字的需要，已如上文所言了；至於『嚴』字，格外重要。因爲今後所立之法，期在必行，將來行起來既然一定是嚴的，那麼現在立的時候，又何能不審慎周詳，以求將來的毫無遺憾呢？這一點漢民以爲也是十分重要，同人等應該注意的。

此次五院成立，是中國政治上的創舉，同時也爲世界政治制度開一新紀元。我們的目的，是要就現在五院的組織試行起來，去鞏固將來憲政的基礎，意義很爲重大。剛才已經說過：現在的五院，和國民政府同受黨的付托，在分工合作的原則之下，執行治權。因此可以總

括一句：立法院是完全受黨的指導，努力於立法的工作的，同人等，惟有一德一心，不容有任何派別的分歧，以力求立法效能的增進，而副黨和政府的期望。澳民謹代表全體同人，致答如此。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 怎樣做到以黨治國與何以要完成地方自治

## ——在五省民政會議講演的一——

民初廣東民政辦不好的三個原因——中央對於五省民政的整飭特別急切，希望由五省而推及全國——革命的政黨離開了政治便沒有黨；而政治離開了黨，也便無所謂革命的政治——「以黨治國」四個字，很充分的表示出黨政不能分離；大家必須真正做到這四個字——黨以政為腐，政以黨為惡，互相水火而不合作，是今後訓政上極大的危機——行政人員對於一切事情，且莫忙責人，先求盡其在我——行政人員要提足全神，貫注四方，土劣共黨，一個不讓他們鬼混進來——惟有實行地方自治才能摧破土劣共黨的堅壁高壘，才能杜絕土劣共黨的發生根源——總理的主張是要人民，要組織衆人爲人民，而不是要時下所有的臨時民衆與非常民衆——民生的解決，國家的組織，主義政策的實現，通通靠

地方自治的完成——清除盜匪，發展交通，是實行地方自治的兩個先決問題——

——怕女權搶了男權，怕地方自治搶了官治，都是笑話，都是錯誤——大家要根本剷除議而不行的劣點——

各位同志：民政會議開會已經多天了，兄弟覺得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因為中央從前祇召集過財政會議，軍事會議，交通會議等等，至於民政會議，這次恐怕還是創舉呢。我們覺得『民政』兩個字所包含的意義非常廣大，尤其在訓政時期的民政，一方面要撫輯人民，使大家各安生業，走上生產的大路，一方面又要訓練人民，明瞭四權的運用，以圖憲政的實現。這種責任，今後都由各位擔負着，是多麼重大啊！兄弟對於民政懂得太少，又沒有什麼經驗，雖然民國元年在廣東曾經辦過一年多地方事務，但並沒有多大的成績，不過知道縣知事是一切民政的基礎，所以很注意去致核罷了。現在不妨先拿它來報告一下：兄弟的性情很暴躁，當時如果那一縣的知事期月沒有成績，或有些貪污的風聲，馬上把他撤換或嚴辦。所以廣東九十縣的知事，一年之中每縣至少要換過三次。當時想用這樣鹵莽操切的辦法，把縣政

弄好，可是終於沒有什麼效果。推究當時縣政之所以弄不好，有三個原因：第一，廣東那時正當變亂之後，地方秩序已破壞淨盡，單就民軍說，全省約有十六萬之多，說起來都是曾經努力革命的，恃功驕恣，把持地方，縣知事雖要做事，也無從做起，這是在大變亂之後，民政辦不好的最大原因。第二，我們無論辦什麼事，最重要的是先有良好的的一貫的政策，然後辦事人有力量才知所用，用了力於事才能有濟。那時的所謂中央，給袁世凱霸佔了，我們怕他做皇帝，時時懷着疑忌。而他呢，對於在革命勢力下的各省，尤其蓄意為難，有心搗亂，希望地方上攪些亂子出來，他好派駐軍隊，名為鎮壓，陰作監視；一方面又勾結土豪劣紳，百般生事，弄得雞犬不安。在這種情形之下，各省拿什麼地方政策教各縣去工作？各縣又能做些什麼事呢？這是因為沒有政策，並且不能有政策，所以民政辦不好的第二個原因。第三，行政官吏沒有確實的保障，黜陟更沒有一定的標準，各縣知事做得好不好，一樣的都可以混過去；如有做了壞事而不能倖免的，那也是他的官運不通而已。所以每地每年雖然換了三次縣知事，還是沒有辦法。這是當時民政辦不好的第三個原因。兄弟說這些話，並非單怪當

時廣東各縣的知事不好，兄弟自己也要負責。當時地方上實在有許多困難，無論什麼人都不能放手幹去的，而上面的長官既又操切鹵莽，怎麼會有好結果呢？

本來做縣知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的責任很大，職務與能力，是否相配，是最大的問題。現在中國已經把從前的許多小吏除掉，把官的數目增長起來了。照目前的制度，一省裏面是兩級制，省政府之下，便是縣政府。我國地方很大，普通人都只知道我國一省可以抵人家一國，那裏知道我們的一縣也可以抵人家一國。人家的一國雖小，却有一國的規模，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等等，無不完備。至於我們縣治所有的，還不如人家一村一鎮所有，祇靠一個很簡單的縣衙門去辦理一切事務。所以論地方之大，則一縣等於人家一國；論制度之簡，則一縣還不如人家一村一鎮。以這樣的情形，而要求地方的治績和人家一樣，國家的強勝和人家比美，怎麼做得到呢？這一次趙部長召集各位到此，商量今後的民政事宜，開會已經多天，想來已議出許多很好的辦法，很好的方案，足以促進今後縣治的發展，應合人民的要來了。雖然因為時間以及其他的關係，這次祇召集五省辦理民政的同志來開會，而未能普及

全國，但這正可看出中央對於五省民政的整飭是特別急切，對於各位的期望是特別深厚。如果各位回去，把五省的民政辦有成績，那麼四方風動，自不難推及全國，都得到無上的效益的，這是兄弟最希望的一點。

剛才吳先生發揮黨和政的關係，十分詳盡，尤其對於黨的主義，有一番極真實的見解。兄弟現在也來就這一點和各位談談。我們的黨萬不能離開政治；因為我們的黨是革命黨，便是『革命的政黨』。它的職責，是處處用革命的主義革命的精神去辦理政治。如果同時我們知道總理主張以黨建國，又主張以黨治國，在訓政時期正需以黨治國，訓政的責任都該由黨來負荷，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革命的政黨離開了政治便沒有黨，而政治離開了黨也便無所謂革命的政治』。這兩句話雖很簡單，可是政和黨的應該打成一片，不可分離，已經很清楚很明顯了。『以黨治國』四個字，很充分的指示出黨不可離開政治。在黨的指導之下的黨員，如果不懂政治，不能担任政治的工作，便是絕大的錯誤！所以個個黨員都應該準備好負荷實際政治的力量。諸位注意：這句話並不是教所有的黨員都準備去做官，是教同志在

黨員的地位上，認識他對於政治的惟一的責任。如果黨員都應該去做官，那麼黨就於政府，或寓政府於黨就夠了，何必政府與黨並立，黨之外又要有政府，政府之外又要有黨呢？以整個的黨領導政府，同時各個黨員又有責任去把黨的主義，黨的政策，在政治上設法推進，企求實現，而真正做到以黨治國的地步的。黨員要做到這一步，非先了解政治不可。如果終於不了解政治，負荷不起這個責任，做不下這些工作，那就不是我們國民黨所要求的黨員。反過來說：『以黨治國』四個字，也已經很充分的指示出政治不可離開黨。總理說過：『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訓政時期就是以黨的主張管理衆人的事的時期，所以辦政治的人，必須懂得黨的主義，黨的政策，並且身體而力行之，使所謂主義政策具體的表現出來，成爲具體的事實。如果辦政治的人終於沒有這種認識負不起這個責任，也就不是我們國民黨所要求的官吏。大家能在這兩個原則之下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現三民主義，而建設光明燦爛的中國！

吳先生說：『現在黨政間所以互相糾紛的，是因爲兩方面不同在黨的指導之下；或雖同

在黨的指導之下，而有一方面却是黨其所黨，非我所謂黨也，羣其所羣，非我所謂羣也」。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我們眼裏看到這種情形，已經很久了。在黨部一方面的人，以為政治機關的人大都是腐化份子，同時政治機關的人却以為黨部已經惡化，進一步辦黨的人便以為非把行政當局攻擊一下，甚至對於行政障礙一下，不足以表示黨權之高，黨員之努力；而行政者又以為若不極端反對辦黨者的言行，即將受制於黨人，不能辦一件事，而且有漸趨於惡化的危險，便不能負地方治安的責任。這麼一來，一面腐化，一面惡化，互相齟齬軋轉，永遠冰炭水火，到底那個是腐化，那個是惡化，誰都弄得莫名其妙！這種惡現象，真是今後政治上絕大的危機！剛才吳先生說：「現在的中央黨部和中央政府，雙方水乳交融，全無芥蒂，是因爲大家都在 總理主義之下努力工作的緣故」。這句話真值得我們思攷。兄弟以為不但現在的中央黨部和中央政府能如此，便是從前在廣東時，黨與政府也早就如此了。我們要使在黨部的人能懂得政府裏的事，在政府的人也能懂得黨裏的事，互相體諒，不作不負責任的批評，和不顧大局的傾軋，處處想到對方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整頓黨國工作的前途，才能

一同走上建設的大道。兄弟早已主張全黨全國要趕緊統一意志。我們如果沒有統一的意志，斷不能生出統一的力量，去完成今後偉大艱苦的革命工作。如果本黨的力量是整個的，統一的，工作的目標是相同的，三民主義一定能在最短期間完成，而總理一生的主張，和臨終的遺囑，也一定能夠實現。現在中央黨政兩方的意志可算統一了，大家便希望各地辦理黨務和政治的人，也以中央爲法，凡爭彼此遵守黨政不可分離的原則，實行聯成一氣，共謀訓政的進展，革命的成功。

照古來儒家的道理，無論做什麼事，都應該注重『盡其在我』。所謂『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統統是這個意思。老子的道理便不然了，他主張凡事一任自然，不爲天下先。我們辦政治，當然要盡其在我，才能得到工作的效能。吳先生剛才已經很明白的說過：『我們三民主義是一點沒有錯誤的，中山先生不是睡在床上造出這個主義的，是包羅古今中外的一切真理——所謂集大成——加以嚴密的組織而成功的。我們以他的主義爲目標做去，一定很合理，很不錯。』固然，在黨務人員中

，有許多青年愛新奇，跑出本黨的主義以外去；又有些不負責任的人，愛唱高調，信口雌黃；這也許是他們的思想錯誤，或經驗不足，以致言行失當，甚至鬧出種種亂子。然而行政者對於本黨主義政策以外的事，一切且莫忙責人，先求盡其在我，拿出我們的辦法，我們的精神，照本黨的主義政策，辦好地方上一切事務，換過社會上一切的環境，以求得事業的進步，是非自有公論。兄弟提出這一點來，希望各位能深切的明瞭認識，並且依着它去努力。

此外還有兩個很重大的問題，要和各位討論的：現在地方行政上總免不了兩種不堪的障礙物，一是共產黨，一是土豪劣紳，一個惡化，一是腐化，統統是搗亂地方，破壞地方的。在表面上看來，腐化，惡化，好像是各不相謀，而且有時絕對不同，可是他們在地方上不斷的鑽頭覓縫，尋找漏洞，去攪壞事，却完全相同的。有時候共產黨說要打倒土豪劣紳，我們正恨土豪劣紳恨個不了，於是不知不覺的就容共產黨鑽進來了；有時候土豪劣紳說要打倒共產黨，我們正恨共產黨也恨個不了，於是不知不覺的又教土豪劣紳鑽進來了。有時候這兩個東西又互相妥協，互相合作起來，共同對我們進攻。他們的態度，會瞬息萬變的，鬧得你頭

昏腦脹，不墮入其彀中不止。從實際上說來，他們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他們所攻擊的對象總是一個三民主義，所要破壞要搗亂的，至少總包含地方政治在內，一樣有害於人民，有礙於我們的訓政。我們要提足全神，貫注四方，一個不讓他們鬼混進來，以維護我們一切的計劃，和最後的成功。

講到土豪劣紳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原因。剛才兄弟說過：我們中國的一縣，可抵人家一國，人家一國有一國的規模，而我們一縣却祇靠極單簡的縣治機關去辦理一切，那知道就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大家知道縣長為親民之官，兄弟問各位做縣長的，或現在代表縣長的，有幾個是真正親過民的呢？如果一個縣長要事事真正去親民，他一定會感覺頭痛的。從前的縣官，什麼事情都懶做。他們的職務，一是向人民要錢，人民對縣官的義務也只有完糧納稅；二是沒有錢便打屁股，人民不能完糧納稅，或不能遂縣官的所欲，也只有準備屁股去搥打。除此以外，縣官對於什麼事情都不及這兩件重要；人民對於甚麼辦法都不及這兩件容易想得；除此以外，人民與縣官再也生不出什麼親的關係來。還有些縣官簡直以政簡刑清為高，

只圖一己的舒服，不管政事的廢弛。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地方上不期然而然的就生出一種紳士階級來了。其實有這種階級，最初不過是地方自治的畸形發展而已，還不能算不正當，說得好聽些，便是不成文的地方自治。因為紳士的所以產生，初時並非他們自己要出頭的，是由於地方上有若干不得已的苦況，要求有這麼一個人出來替他們排難解紛，處理各個人所不能處理的事。這種紳士一定是地方上富有聲望的，或家有恆產的，或曾經讀書的——鄉下人讀書的很少。紳士固不盡劣，也有確曾為地方辦過建設工作，福利人民的。但是凡事，沒有良好的組織，又無人監督，辦法太不完善；後來有些不良的份子，便借此魚肉地方，為所欲為；就是好一點的，也竟藉此為生活，視同行業一般，終於到了『無紳不劣』的地位為止了。這是劣紳產生的情形，至於土豪，却不如此。『豪』之所以成『土』，『土』之所以有『豪』，並不是憑藉他們在社會上的資格聲望，乃是用暴力和其他不正常的手段博得來的。有時他們甚至成羣結黨，為非作惡，人民因畏懼而攝伏，弄到敢怒而不敢言，敢怨而不敢怒，他們的威勢既經養成，人民便永遠受其剝削了。放高利債啊，包攬詞訟啊，武斷鄉曲啊，什麼事情都來了

。各位也許不很明瞭廣東的情形。廣東每每這村的土豪便是那村的強盜，那村的土豪便是這村的強盜。本村的百姓，見了他們，非常客氣，他們對於本村還有些道德。全村的人甚至還要請他做一切的保障，看他做全村的蓋山呢。各位想想，土豪的作用，大到這樣，還了得嗎？總之：推究土劣所以發生的原故，很簡單的一句話，沒有地方自治而已。從今以後，我們如果要真正的打倒土豪劣紳，惟有努力於地方自治的一法。如果不肯從根本上著想，而祇是大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事實上土劣就能打倒了嗎？就能逐漸滅少了嗎？或單單認定已有土劣去嚴辦，他們會臨時躲避一下，事後再行出來的，舊的未曾脫貨，而新的又早已上市，就能完全辦到了嗎？就能永遠辦絕了嗎？恐怕都是夢想吧？甚至你喊『打倒土豪劣紳』，土豪劣紳也大喊『打倒土豪劣紳』，弄得撲朔迷離，真假莫辨。許多人能夠不居士劣之名，而行土劣之實，土劣的惡勢力因此反而愈甚。這一層是諸位要注意的。更像廣東的各村，土豪就是全村人民的屏障，你如果真正把他們打倒，鄰村的強盜馬上來了，無可抵擋，人民就願意了嗎？如果不把村自治弄好，代替了他們的勢力，是打他們不倒的。有些土豪的地位乃由

放高利貸而得來，你要打倒他們，當然要禁止他們的放高利貸；可是就我們各地農民的生活狀況看來，他們能不向人借錢嗎？你一面禁止土豪放高利貸，農民一面將出更高的利息和他們借錢，甚至收錢時先付利息，以免高利貸事實的發覺。你如果不替農民想好根本的辦法，就能打倒土豪了嗎？兄弟總以為我們能夠真正的建設才能夠真正的破壞，能夠徹底的建設才能夠徹底的破壞，無論什麼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實行地方自治，惟其如此才能摧破一切土豪劣紳和共產黨的堅壁高壘，民政的基礎才可以鞏固，而一切的民政才可以發展。

關於地方自治的道理，沒有一個人比 總理再看得明白的了。有許多人固然很知道地方自治的重要，但只知其重要而已，此外便無所知。 總理說『知難行易』，這是永久不滅的真理。 總理看中國人民沒有組織，不能成爲國家，所以他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要很嚴密的組織人民。 總理在民權主義裏說：『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就叫做民』。在建國大綱裏，又確定了許多實行建設的程序和方法。凡此種種，無非要組織衆人，使他們成爲真正

的人民。現在有許多人還不懂這個道理，天天只去攪他們的所謂民衆運動，實則民衆並不是一個烏合之衆。他們高唱著『到民間去』，而實際上腳跡都沒有觸到民間，祇是就衆人當中，搬了一部分工人農人學生出來，亂七八糟的煽動一下，說『這就是民衆』；開大會，喊口號，遊行，說『這就是民衆運動』。弄到後來，這些衆人被他們搬了出來的，再也回不轉本來的地位去，工人便不做工了，農人便不種田了，學生也不讀書了，却天天在那裏大做其運動了。我們想想：如果長久讓他們這樣下去，真正的民衆，和真正的民衆運動，還有實現的一天嗎？兄弟覺得現在的所謂民衆，還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臨時的，一種是非常的。所謂『臨時的民衆』，便是些雇員，在有什麼事情的時候，臨時召集來的。所謂『非常的民衆』，便是不做工的工人，不種田的農人，不讀書的學生；至於純正的老百姓，仍舊胼手胝足的在田間與廠裏，純正的學生仍舊孜孜矻矻的在試驗室與圖書館裏，對於一切所謂民衆運動，終於莫名其妙。我們總理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他口口聲聲說『要人民』，『要人民』，在三民主義裏，在建國大綱裏，都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人民』這兩個字，一切衆人都包括在內了。

，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剽竊的。

目前我們最大的責任便是把整個的人民組織起來，成爲一個國家。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便是譏諷我們沒有組織。但是散沙如果加上士敏土和水，就可以結成堅硬的石頭了。我們現在要依照總理所規定的地方自治的辦法，切切實實去組織人民，就像用士敏土與水去和散沙，結果一定是極良好的。不論什麼事情都注重有組織。就軍隊說：如果幾萬乃至幾十萬兵士全無組織，不知要攪到什麼地步爲止呢；如果有組織，照軍制編列起來，成爲多少旅，多少師，多少軍，非井有條，毫不紊亂，再加以嚴密的訓練，然後作戰，就可以現出很大的力量來了。我們的人民如果有組織，有訓練，就可以沒有漏洞被共產黨和土豪劣紳鑽進來作祟。我們知道中國地方這樣廣大，靠官治是永遠治不好的。不但政府沒有錢設許多官，便是有錢設官，也不是根本的辦法，不合總理民權的主張。總理告訴我們，要替人民多造飯盤。現在中國人的飯盤，天天在那裏鬧不夠，又人人曉得說『有飯大家吃』，那麼到大家只吃到一點點，或竟至無飯可吃時，難道就忍着餓不吃嗎？這自然是不可能的，非增加

米糧，大家吃飽了不可。所以中國經濟上的大問題，是增加生產，拚命去造飯，分利的人愈少愈好。自治還有一樁大好處，既是關於自己的事，由自己去治，總比別人的事格外看得親切些，做得起勁些，比較官治，真不知要好若干倍了。總理建國大綱第十六條說：「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據此，可知訓政時期最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地方自治，而我們三民主義的完成，和五權憲法的實現，也都靠著地方自治。

但是地方自治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頭緒又是非常雜亂的；尤其是智識淺陋的中國人民，驟然間更理會不到甚麼自治。各位既担負這個責任，試問如何去著手進行呢？固然這是一件很偉大很艱苦的工作，我們粗粗一看，覺得在中國現狀之下，什麼事都不能辦，又覺得事事都重要不過，不知從那一件辦起，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先後，我們終於要尋出頭緒，定下計劃，按部就班的去做。兄弟以爲在現在一切地方工作之中，有兩件應該趕快做的事：第一是清除盜匪。現在各處土匪很多，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如果這一步工作不先做好，其餘什麼政治都談不到。因爲人民的生命財產統統沒有保障，便是本來想生產作業的人，也會漸漸的

放僻邪侈起來的。古人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一點不錯。消除盜匪，安定民生，實在是地方自治的第一個先決條件。第二是發展交通。中國各種事業所以不能發達，大半由於交通的不便。照中國地面的廣大，若和歐洲那些小國比較，至少可以分成幾十個，或幾百個國家。在歐美各國，無論大小，他們的交通多麼便利！而我國還是和古代相仿，西北各省簡直談不上『交通』兩字；比較好些的是東南各省，但是不便利還是確切的事實。因此如轉運貨物，周轉經濟，傳遞消息，普及文化，都成了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切國防實業教育等等，也都無從着手，無從進行。所以發展交通，實在是地方自治的第二個先決條件。

有人以為如果各地方都自治，不是要把官吏的治權統統剝奪了嗎？兄弟以為這是極錯誤的見解。從前的男人看女子是供他們游戲快樂的工具，而政府也看人民為一種滿足它行施權力的東西。有這種見解的，都是時代的落伍者。假使男女兩方教育相當，工作相當，只有成為最和諧的家庭的；假如地方能自治，人民有了相當的程度，縣知事豈不更好做嗎？我們看現在做縣知事的人，一會兒要去告示，一會兒要去打賊，一會兒又要去審案，一會兒又要

去相驗，種種事情，集於一身，一天到晚忙個不了，結果還不能有什麼成績，豈不冤枉呢！地方自治如果辦好了，縣知事和民政廳祇居於監督輔導的地位，那又幾多舒服呢！所以怕女權搶了男權，固然是錯誤，是笑話，怕地方自治妨礙了官治，也同樣是錯誤，是笑話，這是大家都應當明白的。

今天兄弟並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各位的，祇是上面幾點很單簡的意思。這次開會已有多天，一定有許多很好的決議可以由各位拿回去實施。但是兄弟總覺得中國人有一個古怪的脾氣，譬如在開會的時候，一枝一節，都非常認真，可是一出會場，大家便一切都置之腦後了，你問他現在當幹些什麼事，他甚至一點莫名其妙；甚至自己親手起草的宣言章程等等，到後來都會不放在心上的。這種議而不行的劣點，以後必須要根本剷除。希望大家既立定主意，便不要忘却，而努力去做，以担負起訓政的責任，而企求三民主義的實現。須知各位來開會議，不是商量怎樣做官，乃是商量怎樣做人民的公僕，和怎樣做 總理的信徒。

## 怎樣去求得我們的自由

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句話，在立法方面有兩重意義——我們應該從法律的範圍以內，取得我們的自由——法律所保障的自由，非爲個人設想，乃爲全體人民設想——法律是求正義的，真實永久的自由，而消滅不適當的，彼此相抵消的自由——立法院對政府是一種機能，對黨是一種義務，對社會是一種事業。今後要用法律來換去條例——立法院應將以前政府所頒，法制委員會所起草的各種法規，通通審查一下——

各位同志：今天是立法院成立以後第一次舉行紀念週，紀念週中，我們必須讀 總理的遺囑。我們讀了 總理的遺囑，知道 總理指示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句話中，有兩個意義，是關於我們立法的：第一，總理民族主義的最大要求，是要中國整個的民族在國際上自由平等，達到一個真正獨立的地位。怎樣才能達到這個地位呢？

那就是遺囑上說的，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且要在最短期間實現了。所謂不平等條約，是人家不以平等待我而訂的條約；現在我們的努力，也就要使人家不能再以不平等待我。譬如我們中國到了今日，還有所謂領事裁判權，在我們國家領土之內，外國僑民無論犯甚麼罪，都不受我國法律的制裁，這可以說是『國內有國』，全世界現在只有我們中國還有這種怪現狀。我們又如何才能在最短期間廢除這許多不平等條約呢？這完全要看我們法治的能力如何，和我們的法律完備與否。這個責任，便在立法院同人的身上，想大家都已經很明白了。第二，總理在遺囑上所說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並非祇求一部分的自由平等，乃求中國整個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立法上最大的一個基本觀念，我們更應該認識清楚。

上面這兩層意思，前天在立法院成立時，兄弟曾經約略報告過；不過那天所說不很清楚，現在不妨補充一些。兄弟所說的話，都是根據 總理的主張，並不是個人的意思。 總理說：『團體有自由，個人沒有自由。所以個人在團體中，就應該犧牲他個人的種種便利』。我們常常覺得 總理的思想和主張是最偉大不過的，他無論何時，都能為將來着想，迎合世界

潮流的趨向。卽如立法一件事，許多人至今還是因襲着十八世紀以前而不認識十九世紀後半，和二十世紀開頭的趨向；可是 總理不然：他在民權主義裏說：『外國人批評中國人文明程度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由的智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他們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總理以爲這兩種批評是很矛盾的，因爲一片散沙就是個個有自由，人人有自由。中國人並且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得很大，中國人的自由看起來實在已經太多，所以一般人好像已經滿足，再不主張要求甚麼自由了。中國人所以會有這種情狀的，有一個極大的原因：中國向來講人治而不講法治，中國是人治的國家，不是法治的國家；不論何時何地何人，都不很受法律的干涉或取締，人人的行動都祇因階級地位的高下而受干涉，却不是法律之下受干涉；因此中國人以前的生活，都是對人負責，不是對法律負責。這樣看來，中國人在一方面雖可以說自由很多，而他方面也可以說因爲各個人太自由了，所以全體或大多數人就沒有自由了。再進一步講，中國所以不能自由平等，就是由於國內散沙的自由太多，而受法律所取締，所保護，在法律範圍以內的自由太不充分。這句話並不是說個人一點自由

都不應該有，乃是說個人應該從法律上取得自由。我們首先要明白：不能說沒有法律的干涉才是自由，有法律的干涉就是不自由；也不能說法律對於人民取締的愈多，自由就愈少。須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並非為個人設想的，乃為全體人民設想的。因為要謀全體的自由，才去限制那種妨礙全體自由的個人自由。這條原則假如不要，就無所謂法律了。我們拿最淺近的事實來說：犯了罪的人就該按法去嚴辦，因為他破壞了他人的安寧和幸福；如果不嚴辦，而顧惜他個人的自由，那一定要弄得大家的安寧和幸福都沒有保障，而大家都失了自由為止。我國人任便什麼地方，都可以自由吐痰，大小便。結果是社會上常常發生傳染病，喪失了全體的自由——呼吸的自由。這種個人的自由，大家憑理智來判斷一下看，是不是應該干涉的呢？又如一個工廠裏假使發散出一種什麼化學的分素來足以妨礙全地方人民的健康生活，而有極大的危險，我們又能為尊重這一個廠的自由，而不顧到全地方人民的自由，便不予干涉嗎？所以為多數人的自由來取締少數人的自由，是法律最大的要求。還有一種是為自由本身來取締自由的。因為普通人總以為自由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實如此解釋自由，往往

本人的自由會害了本人的自由。如一個人儘量的喝酒吸烟，固然是他的自由，但是喝酒吸烟到上了癮以後，要戒戒不掉時，就沒有自由了，這就是本人的自由干涉了他本人的自由。同一個人肉體精神各方面應有的發展，應有的享受，和他這個人人在社會裏應有的要求，應盡的使命，通通消滅了，也就是他本人自由的大大的損失。惟其如此，法律對於妨礙發展個人真正自由，永久自由的事，也不能不去干涉。

總之：法律是求正義上的自由，而消滅一切不適當不道理的自由；法律是求整個的真實永久的自由，而消滅一切零碎的，彼此相抵消的自由。兄弟常說：中國人向來不留心法律，不明自立法的重要，大家不在法律裏面求自由，而和法律對抗起來却非常自由，這樣求自由，沒有保障，終於得不着真正的自由。我們拿最顯著的事實來說：在我國全國，雖小小的一個村落裏，總有土豪劣紳存在着，我們追問一句：這些土豪劣紳怎樣發生的呢？就是由於國家法律和地方制度沒有完善，全國之中為地方自由保障的，為地方全體人民的自由保障的，統統沒有；既為官治所不到，又為民治所不能，於是在官民之外，發生出一種「土豪劣紳治」

來了。現在我們如果想替地方人民求得自由，一定要取締這些土豪劣紳的自由，而且要根本規劃出地方自治的制度法律來。可見法律的所在，就是我們自由的所在。倘若我們只知道求自由，而不知道循着真正自由所在的途徑——法律——去進取，自由，自由，能從空裏掉下來嗎？不然，緣木會求得着魚嗎？

現在兄弟要將立法院的性質，和我們的地位，再略談一談：大家要知道，我們的立法院和各國的國會不同。因為五權制度是總理所創；五權制度之中，立法院也是為各國所沒有的。現在我們可以很單簡的說：立法院不是代議制度，因為立法委員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議士；立法院又不是與行政機關對抗的，因為監察權本是在國會，而總理的「五權制度」却把它提出來另外歸到監察院去。所以我們立法院在政治組織上看來，乃是一個立法的機能；就黨的立場說，是秉承黨——政治會議——的意志，尊重政治會議立法的原則；所立的法，處處要根據總理的遺教，和黨的決議，不違反「黨治」的原則，更謀適應對外對內的種種要求。因此立法院對黨，對國家，對社會。實負有重大的使命。至於我們立法的人，對於今後立

法事業的步驟和目標，先要認清楚，並且要免除許多關於立法的流弊。『法』這個東西，無論古今中外，最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最公平。我們的工作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如果我們不認它爲一種義務，那麼，我們一切創造的心思，努力的趨向，都會錯誤的。所以立法院對政府是一種機能，對黨是一種義務，對社會是一種事業。如果能長保這種精神，不但可以沒有我國以前國會中種種分派的毛病，就是和各國國會相比，也可以免除因某黨掌握政權而立法偏私的弊病。所以前天開會的時候，兄弟再三提出：我們應該完全站在黨，國家，社會的立場上，爲整個的中國民族求利益。這一點本來不祇爲立法院同人說的，凡是在政府，在黨辦事的人，都應該如此；即以黨對人民而論，也是服務而已，爲人民去盡義務，保障社會的安全，給予人民種種的便利而已。我們立法院既是以黨的意志爲意志的，更應體會此層。所以我們的工作，都是我們應盡的義務而已，大家要認清楚。

前天開會時，決定把許多政府交來的條例，統統交付審查，這個議案，經過了最後的討論才決定的。法律和條例，本來有一個很清楚的界綫：所謂法律，一定是經過立法機關，鄭

重討論，決定以後，頒布遵守的；至於條例，是在行政處分之中，在某一部分的狀態之下，適應一時的需要而規定的一種辦法。在這兩種之中，我們當然是應該多用法律，而少用條例。但是我國常常不要法律，而只要條例，不論什麼事便可以隨時立法，隨時執行，使別人沒奈何他。這種惡例從袁世凱開始以來，直到如今，仍舊如此，大家幾乎都認為當然的了。政府有時怕麻煩，也就放任它敷衍下去。有許多更巧立名目，把已有的法律，也弄成條例，一切得以便宜行事，形成一種非法的立法。凡此種種，今後實在非改革不可。按照我們立法院的規章，立法院是現在最高的立法機關。便是國民政府和政治會議的組織，也得先行由我們審查一下。審查原非即可以變更原案，但是可以在原案之外，另外補充，使它更普遍，更完全。而且還有一層：我國地方太大，省區太多，中央事情太繁，機關太多。所有各種條例章程等，我們如果不去管它，不把它立成單行法，統一法，那麼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同一件事，一定要弄成這裏一個章程，那裏一個法規，那就妨害了全體了；如果事事這樣做法，如何得了呢！所以那天開會的結果，對於政府交來案件，都付審查，就是這個意思。我們還

希望能有一個時候，把政府已經公布的法律條例等等，都重新整理一下。在整理之中，並不一定統統去改過，祇研究它是不是和黨義以及其他種種方面有衝突有窒礙。立法本是一件極重大的工作，以前軍事時期，一切從權，爲執行上便利起見，往往很粗率的規定下些法規來；因此各地各部所有，彼此相衝突的，也正不少。以前立法，有個法制委員會，但是這會的性質，祇是準備政治會議諮詢的機關，並沒有獨立的機能。所以我們對於以前法制委員會所起草以及其他機關已經頒布的法律條文，很有整理的必要。我們要很快的把各個專門委員會成立起來，然後將以前所有的法律條文，分交給各委員會去審查，得有相當的結果以後，再報告大會，討論決定。兄弟很希望這些事情能趕快辦理，從速進行，以副人民的期望。至於各位委員的精神都很好，那天第一次開會時，大家都覺得應準備很多的議題，提出來討論，可見大家都很努力。以後自這當本種精神，精進不懈，庶幾我們的義務才能夠盡。

胡漢民先生說說集 第六集

## 平均地權的真義及土地法原則的來源

十七年除夕講於立法院紀念週

除夕是除舊布新的一天，頗有革命的意味——我們所除的，是過去離開三民主

義實現較遠的一段；我們所布的，是未來與三民主義實現又接近一些的一段——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之點——俄國的所謂土地國有，離開平均地權還遠得很——本黨土地法原則定訂的經過。

各位同志：今天是今年最後的一天，現在舉行今年最後的一次紀念週，大家應該把今年一年的工作，嚴密的檢查一番。立法院成立未久，一切工作，都在開始進行中，所以還沒有多少成績。不過本院自成立以來，大家頗能提起精神，努力工作；如果以後長此繼下去續，到了明年今日，一定能完成許多法制，適應黨國的需要，滿足人民的要求的。

我國舊曆稱年底的一日爲除夕，頗有意義。所謂『除夕』，便是除舊布新的一天。意思是把舊有一切不適宜的，從此除掉，而另外就適宜方面的，改換一個新的環境，造起一番新的

事業來。這一點實含有革命的意義。本來所謂革命，不一定是暴動，只要能把一切舊的不適宜的事物根本上轉換過來，成爲新的，適應時代需要的，就是革命。本黨有總理所遺留的，萬古長新的三民主義，我們正努力去企求它的實現。但是我們如果將目前國內的現象，和將來整個三民主義實現以後的現象一比較，覺得兩下幾乎還各在極端。我們如果從現狀的一端發腳，一步一步的向着整個三民主義的實現那一端走去，而不入歧途，不再倒退，那我們便能使我國的一切永久成爲新的，適應時代需要的，我國也便能永久生存於世界。因此今天除夕我們所應該除掉的是甚麼？正是過去所有的離開三民主義較遠的一段。從明天起，我們就要加緊速度，繼向一段新的路程上趕去，和整個三民主義的實現又接近一些了。凡我同人，在今天紀念週中，應該深切認識這一個重大的意義。

前幾天遇到一位同志說：『現在有許多，對於本黨的主義，仍不能真正的了解』。固然，國民黨的主張，統統以救國救民爲標的，但一般人還不免有誤解——尤其對於民生主義。有人以爲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在十三年改組以前好像是改良的資本主義，而十三年改組以後又

好像是改良的共產主義。到底民生主義中是資本主義多一點呢，還是共產主義多一點，很難得一確切的答復。的確，在現在思想混亂的時代，有不少的人在那裏徬徨歧途，無所適從。禁不起反動的人煽動一下，誘惑一下，他們隨即走上錯路，而正義所在，明白的人便更少了。這種情形很值得我們注意。說到民生主義一層，我們要明白：總理的民生主義絕對不是改良的資本主義，也絕對不是改良的共產主義，乃是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骨幹的民生主義。資本而要節制，地權而要平均，分明和資本主義的涵義不合；其辦法又秩然有序，十分澈底，更不是鹵莽滅裂，驅人一時的共產主義所可相提並論。總理於民國十三年便根據民生主義的精義，制定了本黨的政綱，其對內政策第十四項說：『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第十五項說：『企業之有獨佔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兩項對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意義，更其說得明顯。平均地權是主張，而土地國有便是實現這種主張的辦法。我們知道，凡是土地問題，至少

要屬於三方面：一是處分，一是使用，一是享受——收益。總理的意思，要把所有土地的處分權，統統歸於國家，而使用權則由國家授予那些要以土地去生產的人民；使用土地的人以其收入的一部分分納給國家，其餘則收歸自有。在這一原則之下，使用土地的人——地主，如果占了土地不去生產，或將土地給人家使用而從中取利，國家就得征收極重的稅去限制他。爲達到上述的目的起見，必須將土地確定價格，由國家按價抽稅。這個價格，由地主自定，呈報政府。如果地主以多報少，政府可收回其使用權，將土地收買；如果以少報多，則政府照他所報的價抽稅，地主便將大大的吃虧。此後如果地價增長，一切利益應歸國家，由國家用以辦理公共事業，增進社會的福利。因爲地價的增長，每由於社會的改良，和工商業的進步，並不是使用土地者——地主——一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從這一點看來，平均地權的目的，在使地盡其用，并使全體人民都享受到使用土地的權利；而土地國有的目的，在使國家充分的獲得土地處分權，以求平均地權的實現。於此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的土地政策，絕對不同於共產黨的辦法。俄國共產黨曾以若干次的暴動，謀土地問題的解決，幸而這種辦法是對付

他們的對象適宜的，所以暴動的手段，在他們所謂土地政策之下，居然迅奏膚功了。但是這種政策，絕非平均地權，大家要弄清楚。

兄弟在俄國時，很留心看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把土地分給人民。因為土地並不是一種微小的東西，可以隨意接受的。兄弟曾經問他們：『你們的土地，既未經詳細的測量，又不曾好好的登記，在革命的時候，有甚麼方法把它統統平均分配給人民呢？』他們說：『我們當推翻舊的政府的時候，曾經提出兩個口號：一是對德媾和，一是土地國有。後來革命成功，對德媾和固然很容易的辦到了，可是土地國有一層，却不能倉卒間促其實現，只有把一切土地亂七八糟的，按名分派給人民。譬如某地方有多少人，有多少田，就地分派，就地求均；各處地方都這樣辦過，這個問題胡亂就算解決了。』照他們這種辦法，從全部看來，地廣人稀的地方每人所得的田便很多，而人稠地窄的地方每人所得的田便很少，終於是很不平均。他們的所謂革命，本來祇圖奪取政權，並不顧及人民的利害，分田就是了，還管它均不均嗎？單就這一點而論，他們實在已經喪失掉革命的意義了。因此他們革命之後，沒有幾年，

便大鬧飢荒，而大農中農小農的糾紛，更無法解決，這便是政策不肯澈底的惡害。現在蘇維埃政府的土地部。每天有無數的訴訟案子要處理。這些案子，無非是大家爭奪土地權而已。這樣看來。俄國所謂土地政策，離開平均地權的真義遠遠得很呢。所以他們直到現在，因為大農中農小農的問題鬧得稀糟，不能不另想解決之法，人家便罵它投降了資本主義，真不算冤枉，在它也實在是不不得已。我國的所謂革命者，如果不肯看看這樣已覆的前車，而仍舊拚命的想藉一兩次的暴動去解決土地問題，至於將來的結果適得其反，人民如何吃虧，他們全然不理會，豈非喪心病狂嗎？我們要深切明白：俄羅斯抄了我們總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去，而並不用 總理的辦法，於是事實上祇做了不耕者有其田，而耕者失其田。所謂農會，所謂為農工謀利益，祇為共產黨奪政權的工具而已。誰是自耕農，誰是佃農，誰是地主，並沒有分出青紅皂白來，而人民便受害無窮，這是眼前的鏡子，我們不能不照照啊！

講到這裏，兄弟想起一件事情來，可以報告各位：廣東香山縣唐家灣地方，是唐少川先生的老家鄉。去年香山縣農會的聲勢很盛，不用說是共產黨攪的把戲了。有許多青年，居然

贊成他們的謬說，大家擁到唐家灣去搗亂。唐先生和村中父老問他們：『你們說要實行共產，到底是怎樣一個實行的方法呢！』他們說：『第一，我們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如果不耕田的人，就不許霸佔田地。』父老們說：『這很好，我們都很贊同。還有呢？』他們說：『房屋要大家住；如果有空地，不許自己霸佔。此外還要大家做工，不准偷懶。』唐家灣的父老說：『這些都很好，我們也都贊成。只是有了房屋只許住，不許放火燒；見了人只許教他們做工，不許亂殺。你們的辦法我們統統都願實行。』這樣他們在那裏鬧了三天，自動的統統跑了，因為全村耕者都已有了田，住者都已有了屋，人都已做工，地方秩序井然，共產黨雖屬窮凶極惡，也無計可施，只好另找搗亂之地去了。於此我們覺得要防止共產黨的搗亂，只有先整飭我們的內部，如果真能做到無懈可擊，無隙可乘，搗亂者惟有失敗而已。

土地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現在立法院正要着手編訂土地法，實爲目前立法上最重大的事情。關於土地法的原則，現在正由中央審議，已經指定十個委員從事辦理，今天下午各委員就要開會討論。政治會議對於任何法案的編定，從來沒有這樣鄭重過，可見中央是如何

的重視土地法了。這個立法原則，本是 總理當初在廣州時所定，認為是實行土地革命最適用的原則。 總理曾鄭重研究過，在理論上頗採取美國亨利喬治所著『進步與貧困』一書的大意，而辦法却和他絕不相同，因為 總理以為在我國國情中沒有採用他的辦法的必要。至於用許多人暴動一下，經過那些沒收，分贓，種種的手續，以實行其開明專制，更為 總理所痛惡。他對於土地革命的主張，就是他從事革命以來始終肯定的平均地權的政策。扼要言之，便是照地價收稅，照地價收買，和溢利歸公三層。至於實行的辦法， 總理很尊重德國單維廉博士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單氏根據社會主義政策所定的，曾在膠州試行過。 總理以為它在我國很可以行得通。本來民國以前同盟會時代——總理曾有多次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講，對於防止私人壟斷以及地主專擅等等的害處，研究得非常透澈，說得非常明白。至於推行的步驟，也有很好的規畫，並不要應用暴動，搶奪等等不成語的辦法，與反革命的行動。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因噎廢食」，意思是說因為飯不能爽爽快快的吃下去，索性就不吃它。兄弟想來，在吃飯一事上面，天下怕沒有這樣的笨人，至於別的事情上面，可就不然了。即如土地

問題，我們不能因為解決起來困難，索性就不解決。所以 總理終於殫精竭慮的研究，畢竟想出一個平均地權的好法子來。這個法子，在同盟會時代已得其端緒，到了民國十三年，總理更招單維廉博士到廣州去，很鄭重的和他斟酌土地立法的問題，廖仲愷同志也會參與其事，共同研討。關於土地稅率一方面，單氏會假定廣州普通貸款的利率為百分之十，便主張土地稅率也為地價的百分之十。當時 總理嫌其過高，主張暫行值百抽一。 總理在民生主義裏曾經講過：「各國的土地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這是各國通行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就這幾句話裏，已可見 總理的意志了。不過單氏以為無論如何減輕，終不能少過百分之六。因這一點，當時很有爭議。最後廖仲愷同志以為施行之初，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六的稅率也許太高，所以主張百分之一的輕稅率；等到將來，再逐漸的增加。於是根據 總理的原意，更參加了單氏的意見，以及各國的成法，制定了當時的原則，到今日供我們的參攷。本來外國的情形和中國不同：第一他們的土地已為大地主所宰割，所以如果他們實施土地政

策，其大的一定在挽回這種危殆的局勢；第二，他們的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根深蒂固，一切政權大半爲地主資本家所執掌，所以政策往往不能從整個的民生上着想，顧全全體的利益，這種政策就是行出來也不生多大的效力，和良好的效果。我國的情形剛剛與他們相反，總理的平均地權，便是按合國情，作未雨綢繆的工夫。除去陳舊的制度，而另探嶄新的辦法，以遏止資本主義的滋長，爲全體人民謀真正的利益，真是最適宜，最澈底的了。

兄弟前次曾說過：我們的立法，第一要遵照 總理的主張，尊重黨的決議；第二要審察本國歷史上社會上的情形，處處適應人民的需要。這兩點兄弟以爲是非常重要的。一過今天，民國十八年便接着開始了，我們立法院的同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將一切的法規在這兩個原則之下實現出來，使三民主義能具體的成爲事實，以滿足人民的期望，對外也能爭得 總理所講的自由平等的地位。這是兄弟在今天所想着的我們應該除舊布新的一點，切盼各位同志注意。

## 每個黨員要認真檢點過去一年中的錯誤 十七年除夕講於中央紀念週

除夕是除舊布新的一天，大家應該反省過去的錯誤以除舊，重訂未來的方針以布新——檢點過去的錯誤，應由各個人分別在自己身上很嚴密的做起來——黨員在檢點過去中，祇有認錯而已，沒有開功的餘地——諱言錯誤，是我們民族一切不進步的總根源，就從今天起把它除掉——在過去種種的錯誤中，黨員意志不統一是最大的樁——在意志的不統一中，惡化腐化的錯誤，大家祇求諸人，不求諸己，是一個最大的原因——總理的政策最澈底——試將解決土地問題的民生主義辦法，和俄國的辦法一比便知——個人的或片方面的功利主義，完全是大革命，反革命的——一黨之中，分出在朝在野兩派，在野的離開黨去肆意搗亂，都是大錯特錯——中央同志應反省：中央的事業已辦理盡善嗎？兼職的人，果能事事無憾嗎？看黨的工作果能重過其餘一切嗎？——大家從明天

起，振刷新的精神，充實新的力量，去完成新的事業！

各位同志：今天是民國十七年的最後一天，在舊歷中我們稱一年的最後一天爲除夕，那麼今天也可以算是除夕了。所謂除夕，便是除舊布新的一天，它含有兩個意義：第一，既到一年之末，我們便該將過去的一切，檢點一番，認清我們在已往工作中的錯誤；第二，明天就是一年之初，萬象更新，我們又要根據已往的經驗，重行決定我們未來工作的方針。除夕應該除些什麼？應該剷除頹廢，腐敗，等等的惡習，而振起新的精神，去造成新的事業。古人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是說未來一年的工作方針，要在一年開始時決定下來；但是與其決定在本年之始，何如在去年之末就決定好，豈不格外從容呢？至於過去的檢點，要由各個人在自己的身上做起來，所謂「反省」是也。反省的功夫，我國宋明時代的理學家是很重視的，古來賢哲也都以此爲修身立品的準則，如曾子的日三省其身，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的確，我們在工作之中，如果能天天不斷的自已檢點自己，那一定會增進工作的效能，獲得優美的成績的。一日完了，且該如此，何況一年完了呢？

因此我們爲黨服務的同志，在今天除夕，便應該把這一年來自己所做的工作，一件一件，很縝密的檢查一下，看有什麼錯誤。我們現在的檢查自己，和從前官吏年終的大檢不同：從前官吏的年終大計，唯一的目的是在表暴自己的好處，而掩蓋起一切的壞處，作陞官發財的地步；至於我們的檢查，適得其反，是要專門搜尋自己的錯誤，使它一點不漏，毫無矜張自己的好處的餘地。因爲就黨的立場說，我們黨員克盡厥責，做好自身應做的工作，乃是盡了自己應盡的義務而已，算不得有功，更談不到享什麼權利；如果做得不好，却是瀆職僭事，負黨負國，應負完全的責任，應受相當的懲罰。

我國人的習性是最諱言錯誤的。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祇說好話，不說壞話。這種心理，實在是一切不能進步的總原因。關於這一點，兄弟可以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來比喻一下：兄弟平生很愛下圍棋，圍棋雖是小技，却很有許多道理存乎其中。這個頑藝，本來起源於我國，但是現在我國人的棋術，和日本人比較起來，却相差很遠了。我們是發明棋術的，日本是學我們的，何以今日反讓後來者居上，教會了徒弟打師傅呢？這個道理兄弟會細細的推求

過，最大的一端是由於兩國棋譜的編製不同。我國棋譜暗中有着諱言錯誤的原則，只說怎樣怎樣是好，絕不說怎樣怎樣是要不得；卽有指陳錯誤之處，也往往輕描淡寫而已，甚至含混其辭，使人無從捉摸，因此學棋的人不知道避免種種錯誤，往往便故步自封，難於精進了。日本則不然：他們的棋譜，對於任何局勢的錯誤，都很嚴酷的指陳出來，某着爲惡手，某着爲失敗之由，雖名手國手對局，也幾乎無一盤無弱點無失着被指摘出來，昭示大眾的。日本的學者得着這樣反正兩面的指導，理路便看得格外明白，所以棋術猛進，以至登峯造極，勝過吾人了。這是在下棋上而我國人諱言錯誤的大失敗。更如我國人教學生做文章，也往往犯這個毛病。大概教師對於學生的文章，不肯直言其非，所下的評語都是恭維的話，最多加一個但書。如此做法，其初是志在鼓勵學生，久而久之，出口就是諛辭，成爲習慣，雖不盡是『諱言錯誤』，至少也總是『懶言錯誤』。如此教文，在學生方面所得的結果，惟有進步緩慢而已，甚且被放縱成種種的壞脾氣，輕易改不掉。從前還有許多國文教師尤其可笑，替學生改文下批語，總是隨意在文心雕龍或詩品裏面，抄些四六駢聯的句子，一面可以敷衍塞責，一

而又可自矜浩博。學生對於這些批語，大都是莫名其妙，不過大概知道教師是恭維他，說他的文章怎樣怎樣好的，也就覺得却之不恭，受之無愧，儼然以文學家自命，而文理的通順，甚至因此更要延遲個十年八年。這種教育情形，不但可笑，而且可嘆。教師對於學生的文章，有何錯誤，正應該一字一句，很細心，很認真的指示出來，使學生曉得了自己的弱點，立刻好去糾正，然後文字才得一步一步緊一步的前進；在教師方面，也一定要這樣，才合於改文的意義，和爲師的道理。我國人凡事都中了這『諱言錯誤』和『懶言錯誤』之毒，以致數千年來一切文化，乃至民族固有的能力，都在苟且偷安，故步自封當中停滯，倒退，和墮落。我們革命的目的何在？正在打破一切足以爲危害民族生存，阻礙國家進步的東西，然後再進一步確立新的心態，提起新的精神，以完成新的事業。既然黨員爲黨服務，爲黨犧牲，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在這種義務中，若有錯誤，自己和同志都該負責反省和忠告的責任，尤其是自己應時時檢點自己，吹毛求疵的檢點自己，以求改革進步。黨員能夠如此，我們的黨才會有新鮮活潑前進不已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才有完全實現的一天，而我們革命的目的才能完全達到。

。今天除夕，我們便首先把這『諱言錯謬』的毛病除掉吧！

固然，過去的這一年，是本黨工作最向前進展，革命政策最着着實施的一年。民國十七年來，盤據各省，根深蒂固，禍國殃民的軍閥，在這一年內，被革命的武力掃除淨盡了；四分五裂的中國，這一年內，總算在本黨領導之下統一了；這一年內，五院成立，革命的事業已由軍政而入於訓政了。這一個年頭，實在是結束已往，開發將來的大關鍵。但是我們且莫忙想到『將來』怎樣，且把『已往』來考量考量：總理的主義，到底在我們手裏，已經實現了幾分之幾了？對於全國之中顛沛流離，貧窮無告的國民，我們有甚麼方法解除他們的痛苦？歷足他們的願望？我們滿口的『實現主義』『救國救民』凡此種種，我們每一自省，能不汗流浹背，無地自容嗎？尤其使我們慚愧惶恐的，就是在過去一年中，全體黨員的意志十分參差，因而對於國民沒有切實的宣傳，真誠的感化，建設的事業便未曾有長足的進展，而總理的遺教，便不能在最短期間實現。黨員的意志不統一，最足以遏阻全國全民的再生機；過去的事實已經很明顯的昭示我們了，我們同志還不幡然覺醒嗎？

記得去年清黨的時候，我們曾提出一個『打倒腐化惡化』的口號。這個口號本是深中時弊，極關重要的一種普遍宣傳，不分人我之界的。不料到了現在，有許多人不明白它有普遍性，口裏雖然高呼着這個口號，而心裏祇知對人，不知對己，往往只見到人家的腐與惡，而以為自己的言行是完全三民主義的，沒有敬輕敬重到腐惡兩方面去的，雖有人告訴他自己的腐處或惡處，他還不相信。這正為不能把自己跳到人我是非的圈子外面來，切實反省的緣故。本來這個口號的意思是很明顯的：凡是離開三民主義的，不是惡化，便是腐化。有些人實在可歎！他本是痛惡腐化，以革命者自命的人，但他無故又下一個轉語，以為與其腐化，還不如惡化來得革命些，於是大倡其『與其腐也寧惡』的論調。更有一般痛惡惡化的人又轉換口吻，大倡其『與其惡也寧腐』的論調。這兩種謬誤的見解，統統失掉三民主義的立腳點。我們如果犯了它們任何的一種，便是反革命，大家要小心！普通人多半看腐化為夠不上革命的，而仍不免以為惡化為天傾的革命者，其實不然：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一種『中道』，過與不及，不是反革命，便是不革命。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堅決地說：『腐化即惡化，惡化』

即腐化。』因爲它同是離開三民主義的，同是阻礙革命的進展的。真正的革命者斷不能『與其什麼寧什麼』的。由此說來，如果一離開三民主義，事實上一定腐惡彙集於一身，二者不能不能俱免，且亦無從完全排脫任何一方面。這種危險，希望同志們深切的認識，并嚴密的檢點自己，是否會墮入腐惡連鎖的陷阱裏去。個個黨員真能就這一點撫躬自問，不憚改過，黨的意志不求統一自然也就統一了。

從上述的觀點，我們再進而討論一班對於 總理的主義政策至今仍舊懷疑的人。他們不曾深加體察而爲道聽塗說的空想所煽惑，每認 總理的主義政策爲不澈底。他們因爲覺得做一件事，必須要簡捷了當，要馬上見功；凡不能一蹴而幾，不能當面見効的，他們就有點懷疑它不澈底。譬如上樓，依他們最好是一個筋斗就打上去，如果一步一步由梯子上去，便覺得太迂緩，算不得澈底了。這種舍正路而不由的辦法，如果真能做得通，也未嘗不可，但是事實上終於做不通，反而跌得手足都殘廢了，雖欲回頭重行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已不能舉步了，可不糟麼！凡事真正所謂澈底的，一定先要追究這件事有沒有解決的可能；能否達到目

的，如果終無解決的可能，則所謂『澈底』者，也祇是自欺欺人而已，有何足取呢？最近立法院正要着手編訂土地法，現在就借它來做個例子：土地問題是 總理最重視的。民生主義的三大原則，第一就是『平均地權』，不必說了；其次『節制資本』，也和土地有極密切的關係。同時『耕者有其田』，更爲 總理堅決的主張。但是 總理的土政策，和俄羅斯的土政策比起來，到底是那個澈底些呢？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每以俄羅斯的辦法爲痛快，爲澈底，而國民黨的『平均地權』，却要定出土地法等等，以防止私人壟斷，實現所謂『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多麼迂緩！多麼費事！但是我們如果將 總理的土政策，和俄羅斯的土政策，過細比較一下，一定要堅決的說：『還是 總理的土政策澈底』。

俄羅斯處置土地的辦法，實在紛亂得連『政策』兩個字還談不上。兄弟在俄國時，最留心攷察的便是土地問題，而蘇俄當局也最注意我們國民黨的土地政策。當時兄弟攷察之餘，便覺得很懷疑，很奇怪，以爲他們僅做到以土地問題爲一時取得民衆的手段。原來他們企圖推翻克倫斯基政府時，口號是和平與土地，對德媾和是俄國人民人人渴望的事，革命成功，此

事也即實現了。可是土地一層，却不容易解決。既要解決這個問題，究竟先去測量呢？還是先來登記呢？他們覺得這些手續，通通沒有時間去辦，只好把國內所有的田地，亂七八糟的馬上分派起來。譬如我在江寧縣，江寧縣有多少人，有多少田，就按着人數去分配全江寧縣的田地；你在杭縣，杭縣有多少人，有多少田，也同樣按着人數去分配。至於分配的平均與否，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即使各地真能把田地分配時很平均，結果從大體上看去，還是一個不公平，還要生出極大的流弊來。因為每個地方的田地和人數，斷不是相等的。照那樣辦法去做，地方大而人數少的縣，各人所得的田地便很多；地方小而人數多的縣，各人所得的田地便很少；最後的結果，地權還是不能平均。因此到了今日，俄國大農中農小農的糾紛，還是鬧不清楚，麵包的分配，仍不能利益均沾。這些地方，我們稍一留心，就知道他們對於土地問題的辦法，絕非澈底的。這正和一個筋斗翻不上樓，是一樣的道理。史丹林和杜洛斯基也未嘗不知道這層，所以當時都會向兄弟鄭重聲明，他們所以如此，實為時勢所迫，萬不獲已。可知真正的革命者，無論何事，必須定出周密的計畫切實的去；如果用的是鹵莽滅

裂的手段，而心上便作一勞永逸的奢望，那就能實現了嗎？現在俄國所行的土地政策，仍然是土地私有，祇把甲的權移給乙，乙的權移給丙，丙的權又移給丁，大家轉移一下而已，所以杜洛斯基罵斯丹林對資產階級過於讓步，實在不為無理。我們國民黨現在處着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地位，這正是我們實現總理主義的唯一時機，如果放着總理所定的詳盡周密的方案不用，反而以為不徹底，倒認人家鹵莽滅裂，荒謬百出的辦法為徹底，縱不是喪心病狂，也一定是滑稽之尤了。

兄弟剛才說過：黨員克盡厥責，做好黨的工作，終是應盡的義務，不但不算什麼功勞，並且沒有權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黨員見不及此，就根本喪失了革命的精神。兄弟在俄國時，所得的最大的反感，最不佩服他們的地方，就是杜洛斯基和史丹林等，都把中國革命的問題，當做他們自己的功績。併且爭着作為他們自己的勢力，他們天天以世界革命相號召，自己亦以世界革命者自命，但是却把凡百革命事業的進展，都算做自己的功績，甚且為自己去謀勢力權利，豈不令人失望呢！我們要知道：個人的功利主義和片方面的功利主

義，完全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總理說過：『人人應以服務爲目的，不應以爭奪權利爲目的。』我們在黨員的立場上，尤其應該如此；否則時時把個人的得失放在心上，整個的黨便將置之腦後了。以黨治國的意義，是要以整個的黨領導全國人民，負起治平國家的責任。但是有些同志因爲他不能負荷政治上實際的責任，便索性丟開整個的國民黨，去肆意挑撥，肆意搗亂，阻礙政治的進行，這是一件何等可痛的事！現代政黨政治的國家，一國之中，總有兩個以上的政黨對峙，互相監督；地位上雖然有在朝在野之分，然而他們的處心積慮，還是一個共謀國是而已。我國現在本來只有唯一的整個的國民黨，如果一黨之中，也弄出在朝在野的區分來，已經是大錯；若因爲自己在野的原故，便肆意搗亂，以延緩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的實現爲快，那就尤其是大錯特錯了！我們要明白：既做了黨員。既是黨的一份子，便該終身爲黨努力，永無脫卸責任之時。在朝固要爲黨努力，在野也有黨的工作。如果認爲在野之時，便是對黨的责任中斷之時，便是黨的工作停止之時，那就太不明瞭黨是什麼東西了。在野之時，自己如果以爲已經脫卸了黨的干係，自然便難免做出黨以外的事情來，甚至於背

黨叛黨。大家還要明白：既屬黨員，一人失於檢點，便要影響於整個的黨，一時失於檢點，也要影響於永久的黨；同時黨的成敗也就是個人的成敗，個人斷不能有一時離開了黨作打算的。進一步說：在黨的立場上，個人簡直沒有地位。因為黨的主義要黨員去發皇光大，黨的政策要黨員去推進實施，黨員無論有多少精神才力，統統要用在這兩點上，還有餘暇自謀嗎！黨員若放棄責職，不能為黨盡力，已經太自暴棄，如果再肆意搗亂，自營其私那還成其為黨員麼！這層意思，我們同志在自己反省的時候，是要首先注意到的。

再說到在中央的同志，更應該嚴密的把自己檢查一下。兄弟個人雖不能代表中央全體，但是身在中央，自己反省起來，却有許多不能滿意的地方，頗用危懼。第一，中央同志終日太忙，除日常公務外，還要從事會客，演講，種種事情，實際上並未能把中央的事情件件辦理盡善無缺。第二，以一身而担負許多職務的人，尤其要問問自己，是否對於每個職務都盡了責，都認真的幹？第三，在許多工作之中，對於黨的工作，是否真能辦理得重於一切，絲毫沒有荒怠？如果這樣的責問起來，凡是在中央的同志，恐怕誰都不免內疚吧？兄弟覺得現

在的中央，頗犯着臨時應付的毛病。這件事情來了，應付一下；那件事情來了，應付一下；沒有事情來，便沒有甚麼忙了。現在的情形，凡事能應付得了，就算極好，有時連應付都覺踴躍呢！本來中央的地位，是全黨總原動力所在，不是一個應付的機關，凡事應由中央發動，去領導全黨。可是中央現在往往顧不到此，而全黨的精神便覺得差了。現在每個中央委員，一天要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兼了許多事情，却不知道時間如何分配。因此對於應由幾個人共同處理，而不是單獨負責的事情，便不很措意，無形中事情便不免有所擱積了。兄弟個人就不免這種毛病，不待今天除夕來自省，平日早已感覺到。俄羅斯的布哈林曾說：『蘇俄同志能在中央做工作的數不上十人，每人又兼了八九個職務，一個人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能把它一一處理得當呢？』的確，凡在中央的人，每人負責辦理一件事情，猶虞時日精力不足；如果以一人而辦理八九個人的事，再不努力，再不常常反省，而要各方面都周全，如何做得到呢？

以黨治國，黨的唯一的職務在領導黨員，更去領導革命的民衆，共同努力於國家的建設

。這個時期是我們最重要的關頭，無人不該憂勤惕勵的。我們已經規定的四大建設，都要在明年一一完成。事業是非常重大，時間是非常緊迫。自中央以至全黨全國，大家都應該有下而這種感想吧：怎樣可以使時光不要快駛，好讓我們各人多多的盡力，去完成我們十分偉大的工程呢？不料日月不居，轉瞬之間，今年已經完了，明年就要開頭。時光既如此的不爲人留，事業又如彼的不容延緩，真教我們生逢其時，身當其任的人，不知要如何的盡心努力，才能夠有一分力用一分力，有一分鐘用一分鐘，不致浪費時間，不致手忙腳亂。做事情最忌的是走錯了路，而將所有的力量暗中抵銷。我們現在時間既然緊迫，而我們又要力量不枉費，光陰不虛擲，在此一年告終之時，便不得不把過去一年的工作，細細檢查一下，有多少是已經走錯的路，應該回頭或改道的，大家認認清白，從明年明日起，好不至於再錯下去，而明年這一年的時光，才不至於虛擲，我們應成就的事業才得成就。一切的過去，對於我們唯一的價值，就在供獻我們以後做事的教訓。如果對於過去總是不留心，那我們這種人類也太不聰明了。今天是除夕，兄弟特爲提出這點意思來，勉勵各位，更勉勵自己。希望大家從明

天起振刷起新的精神，準備好新的力量，共同爲黨爲國，努力完成我們新的事業！

## 慶祝聲中黨員應有的覺悟

十八年元旦在中央大禮堂講

過去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同志不肯服從 總理的主義，實行 總理的政策——在國運重新的今日，個個黨員要負起真正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責任——所謂慶祝，除恭維道賀之外，還應該含有勉勵與告戒的作用——我們整個民族的利益，終於在我們整個的黨的身上——凡我同志都要放出「前進」的決心，去謀整個民族的利益——

各位同志：今天是我们中華民國成立的紀念日，也就是我們 總理十七年前在南京就大總統職的一天。剛才蔣先生和吳先生很明白的指示我們今後努力的路徑，因為今天的紀念而感想到的，諒各位一定很能領會，完全接受了。蔣先生說：『從今天起，個個人，尤其是本黨同志，要放出新的精神，運用新的力量，完成 總理交給我們的使命。』吳先生說：『現在中華民國的臺快要搭好了，此後就要打起鑼鼓，大家一齊登場，認真賣力唱中華民國的好』

戲了。』這兩句話，都含有切實的意義，足以發人深省。我們爲什麼要在今天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呢？這個意思無論誰都知道的，因爲十七年前的今日，也曾軍事告一結束，而建國於茲開始。但是那時民國的成立，祇是由於清帝遜位推倒滿清政府而已，建國的主義和政策一點不用，不多時國家政權仍爲大小軍閥奪了去，無異是去掉一個大皇帝，生出無數的小皇帝來，國際上政治和經濟的地位還是一天一天的低落，人民的生計還是愈趨愈下，民國的形式當時雖然成立，民國的精神究竟在那裏？直到最近，才由革命的武力，打倒大小軍閥，掃清十幾年烏烟瘴氣的局面，而重見青天白日，國際和民間也才有向前進步的趨勢。我們回想當時革命所以失敗，所以釀成十七年來兵戈擾攘，民不聊生的境地的，不明明白白是由於當時同志不肯服從 總理的主義，實行 總理的 policy 嗎？我們鑒於已往事實上的失敗，在國運重新 今日，軍事再一度結果，建國再一度開始，還能不懲前毖後，切實下一番決心，一切依從 總理的遺教，負起真正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責任嗎？因此在今天熱鬧的慶祝聲中，凡我同志，對於我們以往的錯誤，要幡然覺醒，要從實現 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中，作更進一步的追

求，去確定我們今後的工作與責任。今日難得有吳蔣兩先生的提醒我們，心長語重，我們更當如何的惕勵！

我國文學上向來有一句話，叫做『歡娛之詞難工』，『這句話的確是事實。歡娛的話實在無從『工』起，因為在慶祝的時候，大概只能說幾句吉利話，相互恭維，相互道賀，說來說去，不過是些陳言濫套而已，怎見得它『工』呢？不過所謂慶祝，除了恭維與道賀以外，還應該含有勉勵與勸戒的作用。譬如皋陶的恭祝大舜，就說：『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這三句話雖完全是恭維道賀，但下文又說：『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就完全是勉勵勸戒了。我們自然不以古代君主的說話為美談，但是斷章取義，也可見其不是專為恭維。況且堯舜時代，天下承平，猶且兢兢業業，不忘告戒；至於我們，在開始建國的今日，更當如何的提起精神呢？所以今天我們一方面固然為過去已有的光榮而慶祝，一方面也該為過去失敗的警戒，和今後事業的艱辛而惕勵。從今以後，個個國民都該盡他一份子的責任，謀國家的建設；而在以黨治國的情形之下，黨員除掉盡了國民的責任以外，尤其應該擔負起

黨的重大的責任。因為我們整個民族的利益，終於建築在我們整個的黨的身上，而黨的工作又完全是由黨員來負荷的，絲毫不容旁貸。希望各位同志從今天起，都放出『向前進』的決心，去做黨的工作，去為整個民族謀利益，這是兄弟在慶祝聲中所貢獻於各位的一點。

## 立法院的各委員會應該怎樣努力

十八年一月七日在立法院紀念週報告

去年一年中我國政治上有兩件大事——能夠做全國真正永久統一的保障的，惟有一件事——法治——關稅自主，祇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起點而已，大家仍要繼續努力——本院中專屬的各委員會，要負起各種立法的最根本最重大的責任——外交委員會對於各種外交，要在事前就有精密的計劃——以後外交上的條約要注意，不可讓細則來抵銷原則——編遣會議結束以後，軍事整理有了頭緒，軍事方面的立法就要開始——軍事規畫既定，才有真正的財務行政，財政的立法也就立刻需要了——軍事時期所有的法制，就要分配給各委員會，趕速整理——欲將各委員盡量的加入各委員會使全部工作緊張，以盡各人所有的精神才力。

各位同志：去年一年之中，政治上經過兩件最大的事情：第一是全國統一，北伐完成以

後，南北各省本已全在青天白日旗下，所餘的東北三省，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正式易轍了；第二是外交方面承認我國關稅自主，截至去年年底爲止，簽定這種條約的，已有十多國，還有幾國對於取消領事裁判權，也已訂有草約了。這兩件事，在許多內政外交之中，權衡起來，實在是去年一年中最大的兩件事。但是我們要想：我們政治上何以能夠得到這些成績的呢？是政治本身的力量嗎？還是由於我們提倡國民革命，全國人民都受了國民革命精神的感召，大家起來奮鬥的結果呢？固然，如果從全國各種事業的實際上看來，我們的國家是否已經做到真正的統一，還是一個疑問；此後黨員，國民，和政府，一定要共同努力，才能將我們已有的統一的基礎鞏固起來。就外交而論，現在所簽定的條約，在華盛頓會議，和從前北京會議中，本已有了成議，不過那時祇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現在已把它定成具體的條文了。但是關稅自主，祇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起點，此外如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內河航行權種種，都要廢除淨盡，才算達到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最後目的。就現在的情形說，全國人民當然還不能滿意，就是政府也當然不能滿意。大家都要加緊努力，一步一步的向前，

直做到完善的地步才算呢。

我們立法院在現在這個時期，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比方對外的條約內，有許多關係甚大，非細加考慮不可。我們爲整個民族打算，爲國家永久打算，對於已訂的條約，一時無改動之望的，如有偏頗，或於我不利之處，必須要用己國的法律來補救，這種地方，事實上一定很多。同時所謂全國統一，既然尙未穩固，任何人也不能說出什麼可靠的保障來。兄弟覺得能夠做全國統一的保障的，惟有一件事——法治。不但要事事有法，而且要人人守法，造成一個健全的法治的國家，統一自然永久穩固了。我們趕緊斟酌社會的需要，根據 總理的遺教，拚命去立法，使全國的一切都有了軌範，使各方面的辦事都有一致的精神，那時全國的統一自然是真正的，而且是永久的了。這一點兄弟相信是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的，是特別屬望於本院的。我們並覺得去年一年政治上所有相當的成績的，並不是由於我們的努力，乃由於 總理數十年的提倡革命，和先烈同志無量數的犧牲。今後去繼續這種成績，發揚而光大之，便在我們振作精神，奮鬥不懈了。在這種振作與奮鬥之中，我們立法院的同志，更應

該多負些責任。

現在本院分成五個委員會，凡百法制的編訂，雖然全體委員都要共同負責，可是專屬的委員會更要負重大的責任。因為有許多法案，一定先要經過審查，審查完了，才交全體委員去討論表決。所以每件法案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段工作，仍須各委員會去担負。各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情形很好；平時工作的精神都非常緊張；開會時的討論也非常認真；各位委員也都努力尋求工作，以為有工作做，才覺得愉快，才能夠心安理得，並非把名子派入那個委員會就算了：這都是很可樂觀的現象。

有人以為各委員會人數多寡不同，勞逸也未必均勻，其實不然。譬如經濟委員會，目前事務雖然比較清簡，但是將來關於經濟的立法，一定很多。如勞工立法，土地立法等，都是極重要，極艱難的工作。再如外交委員會，並非專門等待外交上已經訂有條約，拿來審定；凡在某種外交開始之初，或某種外交尚未發動之先，就要早有計畫，供給外交當局參考，然後到了臨時和外人交涉起來，我們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更如現在同外國所訂的友好通商條

約，都是很抽象的幾條原則而已；有了這些原則，如果訂出些呆呆板板的具體的條文來，固然不難，但是如果訂得永久適合事情，日後事情雖儘量的變化，而所訂的條文一經運用起來，終於能夠不喪失權利，那就不能不加一番慘淡經營了。外國人常說：『中國人對於條約，祇看原則，不顧細則。如果原則好了，什麼事情都不管了。』我們觀察多少年來的外交情形，這句話的確是至當不易。外國人識破我們這種心理上的弱點，便用很巧妙的手段，在原則上虛設平等以滿我們的意，細則上還是不平等，終於滿他們的意，而教我們吃虧。從前滿清時代同人家訂條約，統統是以不妨礙中國主權為原則，但是每種條約的條文——細則，統統是妨礙中國的主權的；越到細則，越是妨礙得厲害。試問以不妨礙主權的原則，定出妨礙主權的細則來，訂約人與一般人都懵然不知，甚且還謂為得計，豈不可笑可嘆呢！我們以後和外國訂約，這些地方都要由外交委員會認真研究，仔細考核。所以外交委員會的責任，非常重大，工作也非常艱難。

至於軍事委員會，目前似乎沒有什麼事務。不過現在中央正在舉行編遣委員會，此會是

中國今後政治上很重要的關鍵。此會所決，如能實行，我國不久便是治國，政府也就鞏固，人民的生活也得安定；否則我國還要亂下去，什麼事情都談不到了。這一次編遣委員會開會，全國人民一致的督責武裝同志以黨國爲重，犧牲私見，結果一定是很好的。軍事的整理一有了頭緒，軍事方面的立法便要開始，對於舊有法規的去取，也統統有了標準，就要着手整理了，這便是本院軍事委員會的責任。

軍事弄好，財政才有辦法。現在財政上最大的困難，是財政不能統一。在目前的國情之下，財政不統一，是必然的事。但是財政不統一便談不到財務行政，於是法規條文，即令完備，也等於虛設。如果軍事的規畫弄定，本院財政委員會的工作，也馬上就緊張起來了。

至於法制委員會工作的忙迫與繁重，更不用說了，所以它的人數也比較的多。除了擬訂目前急需的法制以外，對於各機關所已有的法制，也要趕緊審訂起來，以謀整齊畫一。因爲從前爲事實所限，各機關也不能認真立法，所已立的都不免遺漏或偏頗，這是過去的軍事時期必然的現象，無所用其爭議的。在當時只覺把立法權與行政權放在一起，一面立法，一

而執行，一切進行才能便利，而沒有窒礙，蘇俄至今還是這樣；但是長此以往，隨時立法，隨時執行，結果一定要弄得法制蕪亂，而一切事業也就跟着蕪亂起來。譬如工會立法一種，我們會問過蘇俄當局借作參考，他們說：『這個規條太多了，一時也無從摘出梗概。』工會法乃關於工人與工業最重要的法律，他們却弄到繁雜異常無從整理，叫工人如何懂得，如何去適用呢？

在他們所以如此的，無非求一時行事的方便，但是就沒有顧到『朝令夕更』的結果，更必成少數人舞文弄法的流弊，這種情形，實在為法治國家所不許，俄們當然要切戒。對於整理舊有的法制一層，是要按照各種法制的性質，分配給各委員會分頭辦理的。

兄弟還以為各個委員最好盡數參加於各個的委員會使全體委員緊張起來，對於各部立法的事情如果有意見，儘可發表，儘可共同辦理。這樣大家對於各種的立法，平常能多注意，多留心，到了開大會共同討論時，才不至茫無頭緒，才能得到多數人精密的思考，結果才能定出極適當的法規來。固然本院委員未見得個個是專門家，但是單獨起草的時候，自然要有

相當專門知識以集思廣益。每件事情在討論研究的時候，大家所有的精神才力，如果統統能盡，統統能應用到，結果也不會差的；如果雖然是專門家，而大家的精神才力不能完全應用起來，又有何效能可言呢？所謂專門人材，就今日的國內講來，還不能說有幾多。本院本來有設置專門委員的計畫，對於專門人才，就要儘量延攬的。

最後兄弟對於今後舉行紀念週時，還有一個提議，就是希望各委員會的委員長，能夠輪流報告該委員會工作的經過和現狀，以及感想等等，貢獻同人，使同人對於各方面立法的情形，都能明瞭，這也是很要緊的一件事。

# 裁兵是求國家有力立法是求訓政有猷

十八年一月十四日講於立法院紀念週

就軍人本身說，軍隊趕緊屬於國家，屬於人民，免得爲私人爲地方而內爭，軍人自送性命——就國家獨立說，軍隊不屬國家，國家便無國力，永無獨立之望——就國民經濟說，過量的軍隊，一面完全分利，一面阻止生利，如不裁遣，國民經濟永無翻身之日——總理的兵工政策，可以解釋爲使兵士有相當的工作，工農兼包，不必僅限於爲工——從前的軍隊用以內爭，因多而濫；今後的軍隊用於國防，務必求精——軍隊既經整理，國民從此要改革心理，尊重軍人，親愛軍人——移民塞邊，不是放逐，不是徒流，是一種懇荒的實業計劃，發展國民經濟的要圖，今後大家要提倡——尙書上所謂『有猷，有爲，有守，有現』現在訓政建設，正是『有爲』，而立法一層，又是『有爲』中的『有猷』——同一法案，有關各委員會的，應該由各會聯合審查，成立一個審查案——本院要力戒有

派別的議會的毛病，無案不付慎重審查，不得利用時機，草率混過。

各位同志：這兩個星期中，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編遣委員會的開會了。關於這件事的種種，各位同志都已知道，本不必再行報告；不過這個會議關係於國家民族前途非常重大，不妨揀些主要的意思，再說一下。

現在我們都感覺到國內軍隊太多，究竟實數有多少，幾乎都統計不清。至於財政的担負，如果照現在所有的兵額所需計算，簡直把全國收入都供給它，還覺不夠。從國家財政上看來，必須趕快整頓軍隊，那是不用再說了。現在就軍人本身來講：我國已往所有的兵，大都是國民中無知無識，並且貧窮無業，因為求生，才應募而來的，那知結果是求生不得，反而枉死。今後我們對於軍隊，如果再不加以整頓，再不把私人的，地方的，改換為人民的，國家的，而仍聽那些野心家用他們的頭顱生命，去胡亂爭權奪利，這班求生的國民，盲目的軍人，結果仍舊是自送性命，豈不太冤太慘嗎！

其次再就國家來講：兄弟以為治理國家，少不掉兩種要素，一是「力」，一是「法」。以力

對外，以法對內。如果這兩項的効能，能夠表現得恰好，國家便長治久安了。誰都知道國家如果沒有力，一定不成其爲國家；但是國家怎樣才能有力呢？第一必須將私人的軍隊變成國家的軍隊，私人的武力變成國家的武力。武力能完全爲國家所有，然後就這個力量再生出全部的政治的力量來，國家自然安定強固了。現在我們都渴望著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但是如果自己本身的力量沒有充實，而遽然去和頑強無理的帝國主義者談判這些問題，豈不是赤手空拳去與虎謀皮嗎？怎麼會有效果呢！即使憑藉他種關係，所談判的能夠順利而有所得，如果沒有實力做保障，做後盾，所得的一點點仍舊會隨時喪失的。

其次再就我們全國的國民經濟說，全國的財力所以枯窘到目前地步的，第一個原因應該就是分利的人太多，生利的人太少。這種情形正和我國古來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恆足矣』的話，恰恰相反。再加以政治的紊亂，軍閥的跋扈，互爲因果，格外弄到民窮財盡，無以聊生。本來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全國人民有三萬萬以上都是力田的農民，

農民的生產本應該供給全國的需要而有餘；乃事實上並不如此，糧食還須仰給於外人，這是甚麼原故？固然，中國出口的糧食未嘗沒有，但是統計下來，進口數遠超過於出口數。單以民國元年，到民國九年平均計算，出口糧食每年共值一千〇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兩，而進口的在同時期中，平均每年共計三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〇七十六兩，每年入超竟有二千七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兩之鉅。可知國民之中，有一部份人必須靠外來的糧食生活，如果沒有這筆外糧，我國的飢荒，還要鬧得厲害呢。此外如棉線物，自民元至民九，平均每年的進口計值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元，自民九到現在，仍然是有增無減。可知我們中國於衣食的兩大需要，都自顧不周全，至於住，行，育，樂，當然更談不到了。所以一般商品的進口超過出口，在平常年頭姑不必論，連一九一六年歐戰方酣時，也有一萬萬二千數百萬之鉅，我們看了這種情形，真要不寒而慄！總理告訴我們：『建國之首要在民生』。但是在『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的狀態之下，民生問題無論如何是不能解決的。而所謂分利者在事實上最爲分明的，應莫過於軍隊了。軍隊不但自己不生利，並且還妨礙人家去生利。所

以就國民經濟上說，假如不整頓軍隊，簡直沒有辦法；就國家財政上說，也是如此。不過我們既然就分利生利的關係，感覺到軍隊的不可不加整理，那麼，在整理之中，對於實行加以裁遣的兵，就當然感覺到非把他們變爲生利者不可了。萬一裁遣以後，再讓他們淪爲盜匪或流氓，一面自身仍是不生產，而一面仍是阻止他人生產，那又何必多此裁遣的一舉呢？所以裁遣一層，必須替被遣者先找着出路，然後就那條路，再遣他們去，不是隨便遣散的。所謂出路，惟有工與農兩條，這是根據 總理的兵工政策而來的。總理所謂『兵工』的意思，可以廣義解釋爲使兵士做相當的工，不僅限於勞工的一途。它的最大目的，無非在化分利爲生利；工人是生利的，農人更是生利的，所以把不需要的軍隊遣到這兩條路上去，一定能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而增加國民經濟的力量。

至於留存的兵額，必須以國家財政能負擔爲度。照現在的財政預算，兵費不能超過全國收入百分之四十。這個數目，不但是全國人民的要求，而且已經爲黨所決定，在編遣會議中，當然要擁護，要實行的。軍費既不能超出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兵額一定只能有五十師以至

六十師。我們知道所謂軍隊，不止是養著些當兵的人而已，同時在軍備上，軍事教育上，軍事行政上，都要有相當的建設，才可以成爲健全的，有實力的軍隊。如果照現在或以前的樣子，有多少人，有幾枝槍，亂七八糟的就算做軍隊，這種軍隊雖然完全歸國家所有，又如何算得是『國力』呢？過去的幾年中，軍閥們忙於內戰，彼此的軍隊都是五十萬與百萬之間，但是從今以後，我們的軍隊是應用到國防上去了，假使仍舊不健全，國家要危險到何種程度呢？！所以我們現在絕不要多量的烏合的軍隊，而只要是敷應用的，堪稱爲國力的健全的軍隊。這也是我們所以主張編遣的一個重要意義。

兄弟以爲關於整理軍事問題，我們還有幾點是應當注意的。第一，我們很希望以後國家的軍隊成立起來，不祇是軍隊本身能站在國家的地位上，便是全國人民對於軍隊的觀感，也應與從前不同。從前軍隊是私人作惡的工具，人民輕視軍人的人格，而且看他們如蛇蠍一般，軍人方面因此越發自暴自棄，無所不爲，人民便越發以軍隊爲不足齒數，『好人不當兵』，幾乎成爲天經地義了。這種成見，我們今後必須打破。其次，我們中國人有許多事情爲『

「懷安」的惡根性所支配，苟且偷安，缺少振作的精神，這一點實在是今後建設上極大的障礙！譬如我們現在主張化兵爲工，化兵爲農，斷不能把他們支配在已設的工廠，和已墾的田間去，移民一層，是馬上就要實行的。大家如果不能打破「懷安」的惡根性，「民」便不容易「移」動。我們中國的人口，據最近外人的估計，是四萬萬五千萬，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強。我們驟然一聽這話，覺得我們的人口是太多了，其實就中國全部的土地計算，這一點人數毫不覺得密集，比較比利時，和意大利等國的情形，相差還遠呢。我國西北東北各省，赤地千里，渺無人烟，正是今後屯墾最好的場所。可是在南方的人，如果要他移到北方去，他們一定不願意，以爲北方天氣太冷，於身體不宜，或是地方太荒，生活不便，其實這些都是錯謬的觀念。西北東北各省，既然地廣人稀，正可任我們去自由發展，由我們的力量，變荒涼爲繁盛，這不僅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同時還貽後人以莫大的好處，且爲國家立下莫大的功績。美洲，南洋，非洲，各地的開發，當初何嘗不是許多遠地移過去的人民，經過許多艱苦而成功的，那裏是各地土人的勞績嗎？

兄弟以爲人生的意義，絕不在能享受人家已成的事業，而實在自己能創造事業給人家去享受。我們凡事如果有開創的建設的精神，才會得著有意義的人生。從這一點去看移民，看墾荒，自然不覺得它是什麼『不宜』或『不便』的事情了。至於北方的天氣太冷，於身體不宜，更是無謂的顧慮。事實上南方人跑到北方去，身體無有不健康的。因爲寒冷的天氣足以鍛鍊皮膚，使於堅實，自然會增長禦寒的力量；炎熱的地方，溫度過高，往往教人喪失皮膚固有的抵抗力，這一點凡是南方人住過北方的，都該承認。這樣看來，南人移住北方，於生活上，於人生上，都有利益，更何樂而不爲呢？又有人以爲離鄉背井，到渺無人烟的北方去，簡直和從前的充軍一般，殊不值得，但是我們要知道：充軍是『放逐』，乃處置罪人的一種刑罰；移民自是『轉徙』，乃開墾邊荒的一種實業計劃。移民既不是古人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魍魅』，也不是『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還有甚麼值得顧慮的呢？我們就國民經濟，國家財政，以及國防等等各方面看，移民實邊實在是一件必要的事，應該本著革命的精神，趕緊去做，對於以上種種錯誤的觀念，就該完全打破。凡事只要有詳盡的計劃，和堅強的毅力

，向前去做，沒有不成功的，移民屯墾，當然也是如此。假如我們有好辦法，使移去的人，都有地可墾，並且可以連家統統帶去，在那裏安居樂業，慢慢的成爲土著，進一步便照總理的主義，積極實行地方自治，組織成爲真正的人民，而謀三民主義的實現，果能如此，還有誰不願意去呢？這些道理，我們不但教被裁遣的軍人知道，還應該使一般人民都知道，大家都準備去參加這種空前的事業。

尙書洪範說：『有猷，有爲，有守』。有猷就是有完美的計劃，有計劃才能有爲，有爲然後計劃才能實現，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今後我們的工作，也少不了這三個步驟。我們看總理要治中國，先定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等；就是『有猷』。我們按照總理的意思，定出具體的實施的方案來，逐漸的去實行，就是『有爲』。等到實行得有了成績，訓政的工作成熟，以至於憲政完成，一切都上了軌道，國家自然就穩固安定而『有守』了。就以『有爲』的一段最難，最要緊，現在正臨到我們頭上，我們要負起責任來，不畏艱苦的去完成這一段工作。而所謂『有爲』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立法，譬如我們照總理所

定的平均地權的原則可稱是有馱了，我們還多根據牠去定出種種關於土地的法律來，才好切切實實的施行；此前如地方自治，如節制資本，如五權憲法等，也都得由我們努力去作成實施的計劃，然後才能有爲。因爲極高深的理想，必須靠極精密的方法來推行，否則無論如何是不能實現的。而定這些計劃的責任，大部分在立法院，所以在有爲的時期之中，我們立法院的使命，是十分重大的！

以前本院會議中，有許多方案，不祇關係一方面的，曾經交到幾個委員會裏去，對於本案的內容，凡是有關係的委員會，都曾審查。那知因此却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審查的各個委員會，照著他們的意見，做成各個審查案，同時提交大會討論，使大會無所適從，幾乎審查以後還要審查，弄得非常爲難。上星期大會中有一件案子，同時有兩種草案，已經很爲費力，萬一以後同案而有三個四個草案，那如何得了呢！其實這種事情也很容易解決，以後凡是和兩個以上的委員會有關係的案件，初步審查之後，便由兩個以上的委員會聯合審查，集中各委員的意見，做成一個草案；除非意見有不相同不相容之點，才另外提出供大會的參考

。照現在情形看來，法制委員會似乎最繁忙，經濟軍事等委員會比較閑些，以後如果有重大的法案，其他較閑的委員會委員也不妨與法制委員會去共同審查，這樣集思廣益，結果應該更完滿些。

本院的委員，沒有任何黨派的分別，這一點兄弟在舉行就職典禮時，已經很鄭重的報告過，以後接連也曾申說過好幾次，諒大家早已深切明瞭了。凡是有黨派的會議中，遇事常常陷於無辦法的地位，抵銷了無數的能力，最算不來。再則會議中如果在文字上爭論太多，大體上反而不注意，徒然浪費時間，也是最可惜的。向來有黨派作用的會議，往往利用時機混過議案。看到離散會的時間不遠了，就把預備混過的問題提出來，這時候在會的人精力已經疲倦渙散，不能再行集中，便好馬馬虎虎的將該案通過。這樣做法，一定有違法之處，最不應該，本院以後當然要力戒。所以兄弟很希望本院的議案，都在事前由審查會審查清楚，然後提交大會討論；討論的時候，不要斤斤於細節，而忽略了大體。這樣既可以節省很多的时间，做更重要的工作，增進了工作的成績，並且可以免除上面那種混過議案的毛病。

今天中央黨部紀念週，還要兄弟去報告，所以不能多說。上次兄弟曾經提議，請各委員會委員長在紀念週中輪流報告，使大家能明瞭本院各項工作進行的狀況，并且提起本院同人對於立法事業的興趣，今天雖然不及實行，但很希望下星期起，就能開始實行。

## 有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 十八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央紀念週講

盼望全體同志一致督促軍事整理的進行——帝國主義者的欺侮華僑，固然由於他們的野蠻，也實在由於我們的自侮，並且百十年來，已養成他們侵略，和我們屈辱的習慣——從日甚一日的外侮上，去看我們的編遣軍隊，和開始建設，應當有何種感想——數十年來南洋各地虐待華僑的概況——從前南洋各地帝國主義者不忌華僑中的革命者和有知識者，現在恰好相反——我國以前有殖民而無殖民地，有移民而無移民政策，今後非加以糾正不可——我們如得着清明的政治，和相當的武力，就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基礎，也就是世界大同的根苗——我們惟有站在最革命的地位，本着 總理所定的步驟，把一切向前推進，以求國內國外的總解決——

各位同志：過去兩星期中，最重要的事情，不用說是編遣會議了。這個會議的召集，是

根據的五中全會的決議，同時本黨同志以及全國國民，也都認軍事整理爲實行 總理遺教，以建設新中國的唯一先決問題，所以當此建設之始，國府趕緊召集此會，其意義的重大，更無待言了。不過我們要知道：無論做什麼事情，不但應有理想，尤其應有計畫；不但應有計畫，而且應注重實行，使本來的理想，按着計畫，能夠實現。我們中國人做事，向來犯了一個毛病，就是計畫定的或者很詳細，很周密，但是一到實行的時候，並不認真，馬馬虎虎就過去了。我們對於此番編遣會議中所決定的軍事整理計畫，却絕對不能犯這個病，否則國家的前途是很危險的！而且軍事的整理，假如祇是空談，而不去實行，那麼古今中外，泛泛的講這種問題的學說書籍，已經很多，還要我們開會去決議什麼呢？據兄弟看，今後本黨的建國能力強弱如何，我們民族的發展有望無望， 總理的主義究竟能否實行，統統要看這次編遣會議的結果如何，和今後實行得如何而決定。這次會議中，兄弟爲中央派遣出席的一人。兄弟個人對於裁兵問題，沒有什麼特殊的意見；前次曾講過『整理軍事的十大意義』，對於裁兵的必要，已詳細說了。至於被裁之兵，出路如何，無人不認爲是最重要的。現在會議

中正正在精密計畫。據過去的情形看來，大體上此事還算進行順利。我們總希望此會定出一個完美的整理軍事方案來，大家決心去實施，以挽回民族國家的危機，而走上真正建設的道路。還盼望我們全體同志，一致來督促進行。

去年年底，國民政府和十多國訂立關稅自主的條約，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初步工作，這件事做得還差堪自慰。今天有一位新從南洋荷屬地方回國的同志，對於南洋僑胞情形，將有所報告，不覺引起兄弟向來對於海外情形的感慨來，現在不妨先談一下。我們僑胞在海外所受的待遇，十九是極不平等的。所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幾乎日甚一日，簡直到了不是人所能受的地步了。他們如此被外人侮辱欺凌，我們何能熟視無睹呢？無論如何，總得爲他們謀出路，謀解放才是。這種出路究竟怎樣謀法呢？從根本上說，要我們全體同志趕緊奮發起來，領導國民，在一切事情上極端努力，一定要做到我們國家沒有一件事不如人的；一時縱不能如此，在今後訓政期間，也要處處有新氣象，事事有新精神，使人家不能忽視。我們中國歷來在外交上所以常受外人的壓迫的，固然由於外人堅持帝國主義，貪圖種種分外的利

益，從他方面看，也由於他們如此做法，幾十年來，已成習慣，遇到中國人只知援例用野蠻手段對待，什麼正義人道，在中國人面前一時也想不到，說起來真令人痛恨！記得十年前有人勸香港總督待中國工人不要太無理，太酷虐，恐怕有反動，與香港不利。香港總督說：「中國人是什麼東西！我們無論待他們如何酷虐，如何無理，他們還是戀戀不捨的，視香港為樂土。我們雖在碼頭上派了兵警嚴厲的對付，每人要先打幾籐鞭，才許他們上岸，他們還是要來的。」固然從前這個香港總督的言論，實在糊塗混帳，但是我們遠涉重洋的同胞，受種種屈辱，這其中也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原來我們僑胞因為國內秩序不好，百業凋殘，無以為生，便覺得海外，是唯一的求生之所。在這樣苦苦的求生之中，僑胞們每到一個地方，前面遇到外人的羞辱雖然厲害，爭奈後面的生活問題逼得尤其緊迫，權衡輕重，還只有一時含垢忍辱，靦顏向人。如此看來，中國雖大，簡直沒有一塊乾淨土給人民安生立命，然後大家才向海外去飄流，受着外人的欺侮，雖然心有所不甘，但是想想祖國的情形，回頭無路。這完全是由於本國政府自己先不爭氣，才逼得國民如此，才引得外人輕視到這步田地。孟子說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句話終究不錯的。民國以前，我們整個的民族統統在滿洲專制政府壓迫之下，人格早已喪盡；加以他們的政治壞極，到了後來，一切簡直倒行逆施，自侮到十二分，引得外國人的帝國主義，逐步發展，而養成外人侮辱我們的習慣。民國成立以後，國民和外国人都以為今日之中國和以前不同了，那知十餘年來，軍閥專恣，每况愈下，中國政府格外自侮得厲害，於是國際地位，更不知低落了多少，而外人的侮我，便格外肆無忌憚了。已往的事實是如此，今後我們應當怎樣？我們既努力於取消不平等條約，凡百外人對於我們的侮辱，今後是通通要消滅的，我們還能再存留着一毫的自侮嗎？試從這一點上再去看看編道會議，和一切建設的事業，我們格外得着澈底的覺悟了。

當我們僑胞受祖國的壓迫，無可為生，決心含垢忍辱，出去向帝國主義者求安身立命之時，帝國主義者覺得這些人的前來，於他們的地方很不錯，就利用我們僑胞去代他們的地方生利。墾荒，製造，建築，舉凡一切勞苦的事，統統教華僑去做，把華僑當做他們墾荒的牛一般用，也就當作牛一般去虐待。耕牛耕到老時，當會被農夫賣去宰殺的；外人待華僑，

有時也是這樣，替他們把地方興了，利源闢了，到了後來，常會借個不相干的原因，把我們驅逐出境，而奪去所有的產業。我們僑胞絲毫沒有祖國的保護，無端被逐被奪，惟有忍受而已，有什麼辦法！在南洋的同志，大概是廣東福建一帶的人多，帝國主義者不但不把他們當作獨立國家的國民看待，並且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種種慘無人道，背理絕義的待遇，我們不一定要身受了，一榕榕的祇聽那身受或目視的人談起來，就要心酸淚下，髮指眦裂了。在南洋一帶英屬地方比較好些，至於荷屬法屬的情形，簡直不堪設想。這裏所謂『好些』，固然是比較的，而且這種比較，也實在是山無可比較之中勉強比較出來的。無論英美荷法各屬地方，其以華僑爲墾荒的工具，則大家一律，並無二致。這種情形，兄弟在二十年前已很明瞭，有幾處且曾親身經歷過。凡是華人坐船到一個地方去，在沒有上岸之前，就看得像罪犯一般，終日監視着。等到帶到海關地方去時，先有人來細細的檢查身體，甚至細到臉上有無疤痕，有無麻子，用一種相面式的端詳，教人難堪。至於量身長，稱體重，打手模等等，更不必說了。身體查畢，便開始問話。問話的情形，和審訊罪人一般，好像登岸的人是存心攪

他地方上亂子似的，追問得一點不肯放鬆。最後便要保人和保證金，如果沒有，休想入境。及至允許入境以後，還要限定居留的時候，如果逾限，立刻驅逐出境。平時又要遵守許多章程規矩，在荷蘭屬地，不許有十二個人以上的集合，如果這樣馬上便『阿恭』，所謂『阿恭』，便是處罰的意思。晚間惟獨華人不准出門，如果有要事須夜行，必須辦好照會；而這種照會辦起來，手續實在不易。我們僑胞弄得沒有辦法，便攪出一種奇怪的花樣來，每逢夜晚要出去時，化一二塊錢，叫一個日本的妓女伴着，做活的照會。原來日本僑民晚間是可以自由出外的，中國人有了日本女子在身邊同行，警察就認你也是日本人，而給你沾沾自由的光，我們僑胞便不啻是臨時入了日本籍了。大家試想：在這種地方，我國無論是怎樣規矩的人，總比不上一個日本妓女來得有人格，豈不愧死麼！當我們上岸的時候，看見那些日本浪人，日本妓女之類，都無拘無束，大搖大擺的走了，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有產者，無產者，有智識的，無智識的，統統要受種種的留難，早就氣昏了；更加日常晚間出門，還要仰仗他們妓女的保護，凡是有血性的，誰能忍受得了嗎！那時一班老同志對於華僑的痛苦，看得很清楚，

義憤激發到萬分，決心非革命不足以爲人。當時滿洲政府對於華僑，更看作化外之民，漠不關心；所派的些領事們，也都不負絲毫責任，終年祇在領事館裏，關起門來打他們的麻雀。至於僑胞之中，又有許多敗類，甘心給外人收買，做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這種情形，在荷屬法屬的殖民地格外厲害，所謂『馬腰』，『甲必丹』等等，統是魚肉華僑的爪牙。帝國主義者專門利用中國人以箝制，壓迫，剝削中國人，這種方法非常惡毒。於此我們格外感覺到自侮然後人侮的道理實在顛撲不破。在安南地方，有所謂『幫長』的，也和馬腰甲必丹差不多，專門聽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去搗華僑的蛋。做這種勾當的人，私利是不必說了，但他們一面唯利是圖，一面還以爲榮耀，簡直恬不知恥；至於無數的同胞，因爲他們而受外人的壓迫和侮辱，可就難以言罄了。這是兄弟親身所經歷過的情形。

目下南洋各地待遇華僑的情形，比前更差了！所差何在，讓兄弟先說一段從前的事實來做個例證。十餘年前，我們到南洋去，地方官吏先要問各人的出身如何，在國內做什麼事情，到那裏去幹什麼。如果比較是有智識的，所謂『斯文中人』，一切限制便稍微輕鬆些。記得

兄弟那年到小呂宋去，爲革命軍籌餉，菲列賓人對於兄弟本來很抱同情，但是因爲兄弟沒有護照，上岸時美國稅關已經得到袁世凱的電報，不准登岸。後兄弟和船主交涉，乘他警察不及制止之際，跑了上岸，他們又出票來拿兄弟。兄弟知道美國人身保護狀的規定，法庭能將稅關或警察所拘捕的人，立時提去的，便根據這個條例，向法院控訴，並延請律師，代理辨護。法庭開審時，對方是海關的稅務司。幾位法官都是菲列賓人，對於兄弟圖謀革命的行動，很表同情。菲列賓的法庭是這樣的：幾個法官向外坐着，前面放着桌子；法官的對面坐着律師；法官祇向律師問話，到必要時才傳問原告和被告。那位首席法官看了這件案子以後，知道對方捕兄弟是因爲兄弟沒有護照，違反了他們的工約，而兄弟控告的，是他們濫施拘捕。這位法官很有趣，他開始就說：『我們就法律的立場講，所要問的是『犯罪者』，是『犯罪人』的人格，我看胡先生是斯文中人，他來小呂宋斷不是做工的，所謂工約，當然不能適用，這是第一點。第二，他是革命黨人，革命黨是反對政府的，如何再能向政府領護照呢？所以沒有護照也是當然的事，算不得違法。從上述兩點看來，胡先生應許其自由居住，且不必

附以時限。』稅務司方面尚要發言，他說：『這件案子就如此判決，如果有那方不服，再行上訴吧。』這樣一來，兄弟就回復了自由。這是十多年前的事，因為兄弟是文人，又是革命黨，而得有如此的好結果。至於現在，尤其是荷蘭屬的地方，帝國主義者對付華人的心理和手段，却剛剛與此相反。他們所最忌的便是有智識的華人，如革命黨員，新聞記者，學校教員等等，往往禁止上岸，或上了岸不久又驅逐出境。因為這類人到南洋積極提倡文化事業，開辦學校，提高僑民的程度，養成他們愛護祖國，反抗強暴的觀念。的確，南洋僑民十餘年來經過這些人的宣傳教導之後，智識程度猛進，帝國主義者遇事都不能隨便了，這種明顯的事實，誰都看得清楚的。試舉一例：在從前英荷兩屬的南洋僑民，大概來自潮州，瓊州，和福建各地。這些地方的同胞說話，我們都不大懂得。遇到他們回國來報告甚麼時，非由懂他們的話的廣州人，替他們翻譯成廣州話，再由廣州話翻譯成普通話，然後大家才能聽懂。現在不然了，從英荷兩屬回來的僑胞，十九都能講普通話，而且講得非常流利了，這就是十餘年來，僑胞中的同志努力辦學校，用國語教授學科的成績。這種事情最遭帝國主義者之忌，

因爲他們不但希望我們僑胞的言語不統一，彼此隔閡，不能聯合，有所作爲，而且還希望他們連中國的文字都不認識，大家蠢如鹿豕，好任他們去宰割。僑民如果要讀書，祇准讀荷蘭文，而且教員也必須懂得荷蘭文才能教書。如此高度的文化侵略，以及求知權之被剝奪，實在是足以侵蝕乃至喪失我們全體僑民的民族思想，終身爲人作馬牛而不自覺。這樣看來，現在南洋各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華僑，比十餘年前，豈不更厲害，更沒有道理嗎？

在這裏我們應當切實的反省一下：從前我們總說滿州政府如何腐敗，如何顛預，非打倒它，另建中華民國不可。現在民國的招牌已掛了十多年了，和滿州政府比較起來，到底有甚麼高明的地方呢？假如一切和前清一樣，已經是我們的慚愧，萬一還有不如前清的，那我們又怎麼過得去呢？固然，以往的十多年，都是軍閥專政，爭權奪利，全國人民都在愁苦的境地中過生活，所以對外仍舊不免自侮人侮的現象；但是現在，本黨已經統一全國，而訓政已經開始，我們的國力就應該一天一天的進展，對內對外，就應該得着些新的成績才是。我們中國以前有殖民而無殖民地，有移民而無移民政策，今後非糾正過這種情形不可。假使今後

我們的僑胞在世界上仍舊擡不起頭來，一切和以前一樣，甚至更不如以前，那我們幾十年革命的效能，究竟在那裏？我們到底糊糊塗塗的做些什麼事呢？凡是看一件事，總有主觀和客觀的兩方面，常會得着兩個不同的結果。即就僑民問題說，我們覺得現在僑胞的地位，比從前更不如了，但是何以如此的呢？還是因爲人家的作惡愈甚，待遇僑民比從前更無理，更酷虐呢？還是因爲我們的爲善不足，國際地位越發傾下，不能教人家敬服呢？怪人家不好是主觀多，同時如果能夠反省，再多用點客觀，然後事情的真相，才格外明顯呢。

現在就我們本身講：假如我們能有幾十條兵艦，常常游弋南洋，極盡保護僑民之責，試看，各地的帝國主義者的態度如何，待遇如何！即令海軍不行，而國內的陸軍有個樣子，不平等的條約早已推翻，英荷的外僑來我國，我們看他們如何待遇我們僑民的，我們也怎樣待他們，那麼我們僑胞在外國，還會吃虧嗎？大家知道軍隊不在多而在精，但是我們的軍隊，到底精不精呢？民國以後的軍隊數量，比前清的時候，多出好幾倍；說起實質來，兄弟敢武斷一句，很多不如前清軍隊的。前清末年的軍隊，命令統一，教育統一，設備完全，非我

們現在所能及，這一層知道的人很多。固然我們自己不想做帝國主義者，而專以武力爲後盾，去侵略人家，但是我們必須有能力捍衛國家，保護國民。我們一面主張正義，謀真正的世界和平，一如總理天下爲公的懷抱，但是一面還要做得國家像個國家，國民像個國民，國際的地位日高，然後說話才有人注意；不然，國內的政治一團糟，國外的僑民與亡國奴無異，雖然懷着總理的大同主義，竭力宣傳，但是弱肉強食，誰理會你呢！所以我們如果有了清明的政治和相當的實力，就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基礎，也就是世界大同的根苗。總理說：

『有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這個道理是何等的透關，而值得我們思念與實行！我們一面聽到僑胞在外境况之日非，一面看到國內建設之幼稚，一面又想到總理遺教之宏遠，我們不能不慷慨奮勉，急起直進，真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呀！

當我們多多的用客觀去追求評判，得到許多『今非昔比』，或『每况愈下』，的種種感慨，種種疑懼時，我們同志不必灰心，更不必妄自菲薄，還要深切而嚴重的知道一層意思，就是我們國民黨目前與今後的工作還是最革命的，並不是保守的，或後退的，開倒車的。我們絕

對不要袁世凱『維持現狀』的謬說，而只要按着 總理的主義，企求新中國的實現。袁世凱在民初，竭力以維持現狀爲號召，他說滿州政府已經推翻了。革命已無所用了，所以維持現狀是今後行政的第一義。這種話是我們所深惡痛絕的！我們認爲維持現狀是反革命的主張。假如現狀可以維持，革命便成爲『多此一舉』了。我們祇可說使人民生活安定，國家大局穩固，却不能說維持現狀。我們應該不息的就現狀去推進它，使新的局面一天一天的開展。假如現狀停滯，無可推進，就得用較猛烈的手段，再去破壞一下，以達到可以推進的目的。地球的公轉與自轉一天不停，世界上人類的一切是應該前進不已的，保守固所不容，退後尤其無路。真正的革命者，就是站在世界前進的大道上，看準了這條大道有最善美的一種境界，而推進人類，一齊到那裏去，這其中談得到什麼保守或退後嗎？所以革命者斷不能以現狀自滿，而且所謂生活安定，和休養生息，也斷不是在維持現狀之下所能獲得的。我們要生活安定，休養生息，也惟有凡事依着 總理所定的步驟，向前推進，國內國外，自然會得着一個總的解決。兄弟的報告止於此，現在就請新從南洋回國的一位同志，報告該地僑民的最近情形，

和關於今後改善僑民地位的意見，請大家注意。

有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

謝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 最近外交上面的兩個要聞 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

總理教我們聯合民衆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要知道怎樣奮鬥，奮鬥些甚麼——中東鐵路問題，是俄國開始與日本妥協——英日聯盟既然重提，日本所有野心，終於難掩——有人不要外交，不懂外交，不負責任，隨便批評，那斷非同志所應爲——大家注意外交和國際情形，認清一切，督促政府，逐步的做去，以達我們最後的目的——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兄弟報告兩件外交方面的事，請大家注意。我們國民革命最大的目的，是求中國得到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因此我們對於國際上和本國外交上，不論什麼事情，都要留心。上星期六，本院開大會，審查中德等幾國關稅自主條約，討論之中，大家都以兩種意義爲重：一是關於國家威信，政府威信的，一是關於我們立法精神的。關於這兩點，全體委員差不多主張一致，這是大家留心了國際間和本國外交上的情形以後，所見相同之

處。我們不能忘記 總理給我們的外交上最根本的政策：『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裏所謂『奮鬥』，到底奮鬥些什麼呢？就是奮鬥去達到我們國民革命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到底應該怎樣奮鬥呢？兄弟以前已經講過很多次，就是大家要努力實際工作，把國家建設得有個樣子，一面養成國家的實力，可以應付一切，一面隨時再懂得國際間的關係，除此之外，別無巧妙了。

最近外交上的兩件事情，一是關於中東鐵路的。有許多外國報紙說：俄國和日本田中內閣秘密交換條件，俄國想把中東鐵路既得權讓給日本。按俄國是以世界革命者自命的，本來不能，而且不應，有這種行爲。在張作霖時代，它強認中東鐵路在它的勢力範圍中，藉口張作霖和日本親善，有不利於俄國的危險，所以把持着不肯放手。它以為如果把該路完全交給中國，就無異全部爲日人所佔據了。因此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處處和張作霖妥協，平分許多利益，祇求不要另起風波，大家平平穩穩的過去。不料民國十四年，中東路發生了一件事，張作霖拘捕了中東路上俄國的局長。當時俄國方面認定此事有日本人在後面唆使，國內

的輿論一時非常激烈。第三國際和它的政府及黨的機關報都派人請教兄弟，問兄弟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兄弟曉得他們的意思，便反詰他們：『你們向來是主張世界革命的，現在既達到了世界革命的問題，你們自己對於這個問題，到底採取什麼態度呢？還是向日本妥協，還是採積極的手段，到必要時，竟和它開仗呢？』兄弟並將世界革命的理論和事實，同他們講了很多。他們說：『我們是來探問先生的意見的，先生却發了一大篇議論，反而要我們回復。照現在俄國的軍備情形，絕對不能和人開仗。而且俄國對於世界五強國中，祇以英國為敵，並不以日本為敵。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究不及英國帝國主義來得厲害。此事假使可以和平了結，我們也斷不願與日本決裂，這是第一點。第二，照俄國的經濟情形看來，也實在沒有和人打仗的可能。這句話本不能告訴外國人的。我們的經濟，因連年內戰，農工差不多統統破產了，這幾年改行新經濟政策，好容易才恢復到相當的地位。假使一開仗，全國農工立刻就不行了，國內經濟也立刻就不行了，弄得不好，也許連政府的地位還要動搖。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與事實妥協』。兄弟聽他們如此說法，知道確係實情。至於那時日本方面，是幣

原執政，對於聯俄問題祇崇許多商人，和二三等的政客去活動，所以一切也不大認真。後來田中組閣，就不然了。田中曾經留學過俄國，他自己能講俄國話，有時為嫌他人居間的麻煩周折，便親自和俄國駐日大使談判。而報紙上所發表的消息，却非常輕微，好像沒有甚麼重大事情似的。但是我們想想：以一個首相而兼外相的田中，親到外國的使館裏去，和外國使官會議，所談的事情，會怎樣輕微嗎？本來關於蘇俄和日本間的事情，久已在若即若離的狀態之下了；但是如後藤，久原等等，有好幾次跑到俄國去，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特別原因呢。我們對於中東鐵路的問題，不能看得太小。照國際公法說，日本和俄國，當然無權解決我們的鐵路。有它所有權的獨立國家在，誰能將它的權利私相授受呢？至於實際方面，俄國現在所以如此做法的，為的是早已有心和日本妥協，這一件事就是造成機會，而妥協開始罷了。同時俄國的經濟力量，近來更弱，在他們以為藉此可以得着一種臨時的收入，也說不定，所以他們覺得比日本還要起勁些。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近來外報所宣傳的英日聯盟。這件事本來已經過去了，但是日本人

至今還抱這種希望。在他方面又以爲如果英日真正再聯盟，就會發生很多的糾紛，尤其是各國在中國的地位，立刻要失掉均衡；只看從前英日聯盟終止，纔有華盛頓會議的召集，就可見國際的關係。固然我們的事，我們自己自有主權和主張，不能聽別人越俎代謀，隨便處分。它們那些國家，各有各的利益不同，也未必真能協調，而以善意對待我們。我們永遠不能相信它們大家都是很光明的心地，把一切侵略政策拋棄了。所以雖然如路透電等所傳，日本報紙的意見，以爲關於英日聯盟的事，必須預防種種易有的誤會，勿使人感想到日本或將借與英國合作的情形，格外厲行壓迫中國，但是在現在情形之下，無論如何，日本方面總不能避免這個嫌疑。他們對於自家不當有的帝國主義和政策，如果沒有澈底的覺悟而情願拋棄，我們是永遠不能相信他們在這些事情之中沒有野心的。况且日本對我國前後一貫的態度，至今並未改變，觀於最近漢口的水案，就可知道了。這種事情，不但外交當局認爲嚴重，便是國民有心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得到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又那個不憤慨，不認真注意呢？

近來有人於中央最近對內對外的政策認爲不滿，其實據兄弟看來，中央的種種措施，統

統是應合事實的需要，而且是秉着 總理的意思去做的。有人說現在的政府腐化了，而唯一的理由是說政府與帝國主義者太接近，因此一點，政府無論如何提倡建設，如何努力工作，也統統是腐化。這種偏面的觀察和判斷，一望而知是很錯謬的。固然，現在外交方面的成績，我們不能認為滿足，離開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還遠，但是以最近簽定的關稅自主條約，和我國以前向人家訂的關稅條約比比看呢？最近所定，總算是雙方互惠，而不是片面權利的了吧？這雖由於國際上已受了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的感召，而不是政府中幾個人的能力所做到的，但是若因為政府中人和外國人定訂這樣的條約，便說是接近帝國主義者，那麼試問這班人所最崇拜的蘇俄，何以天天希望同英國訂通商條約，更希望美國資本家去投資呢？難道他們所最崇拜的蘇俄，現在也在那裏接近帝國主義，而整個腐化了嗎？兄弟以為這班人所以說些沒有根底的話的，大概是在兩種蒙蔽之下：第一，由於他們不要外交，想學俄羅斯革命開始的時候那樣，一切對外的條約統統不要，關起門來斷絕國交。但是這種事實，俄國雖一時做了，可會能持久呢？何以他們現在又天天想在外交上求發展呢？我們學他們從前那樣做一做

，到底有甚麼好處？第二，他們不懂國際情形，不認識現在中國的地位。中國到了什麼地位，才能做什麼事情；否則不顧事實，到處都會碰到牆壁的。我們現在祇要能把國家已失的權利，從艱難困苦中，逐漸挽回過來，祇要不蹈從前滿清政府，和北平軍閥政府覆轍，不斷送國家的一切權利，就算是盡了目前的責任了。如此做去果能始終不變，在最短期間，就能達到最後的目的，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兄弟常常說我們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必須認清現狀，一步一步的做去。如果不顧事實，隨便批評，斷不是同志所應為。不過同志對於這些事，先要注意，先要弄清楚而無所蒙蔽，對於那種是目前的事實，那種是最近的希望，統統看得準，然後才不至於說出責任以外的話來。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 爲黨服務的人絕不應有權利思想

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講於中央紀念週  
京市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典禮

社會上任何的服務，都不能建築在權利思想的基礎上——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好處和壞處，應該同樣注意——本黨十三年改組以後的好處和壞處在那裏——在蘇俄所謂革命中，功利主義是怎樣——我們的所謂革命，和所以革命，根本都與蘇俄不同，大家不能盲從。——腐化與惡化的同一根源，是權利思想；而權利思想的根源，就是『私』而已——大家保存着一副純潔的偉大的『犧牲一己，以爲民衆』的心身，去領導民衆，實現主義，完成革命！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中，有南京特別市市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在此就職，兄弟謹代表中央，向各位說幾句話。

普通在社會上擔任職務的人，當他第一天就職時，往往便有一種感想：『從今天起，我有了職位，馬上便有權利可享了』。大家腦筋中先如此存着一種權利思想，然後再去爲社會

服務，實在大錯！因為社會的組成，和社會的進展，都不是建築在權利的基礎上的。服務就職之初，好比行路，剛剛發腳，如何能就踏上這種歧路呢！至於在黨部工作的人，更談不到『享權利』三個字。他們在就職之初，腦筋中應該絕對不存什麼權利思想，以矯正一般社會的不對。總理曾經告訴我們：『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不應該以權利為目的』。凡我同志，平日對於總理這個教訓，要如何的切實體會才是！兄弟希望南京市市黨部全體執監委員，首先奉行總理這個教訓，澈始澈終，沒有一點爭權奪利的思想和舉動，而完全為黨盡義務。南京乃全國首善之區，南京全市的黨務，從今天起，付託給諸位了，諸位自當以總理這個教訓去領導全市民衆，並且也就以這個教訓去勉為全國黨部的模範。

兄弟對於本黨過去的歷史，嚮來很注意的；就是本黨黨員，對於本黨的過去，各人都有一種觀察。近來很多同志曉得本黨十三年改組時的精神，和十三年改組後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中國人普通有一種毛病，對於過去的歷史或人物，往往根據於『隱惡揚善』的道德觀念，祇肯說好話，恭維牠，而不肯用同樣的態度去批評牠，表現出牠的壞處來，以垂炯戒；

甚至對於那些壞處反極力掩蔽，以爲那樣才是忠厚之道。殊不知已往的壞處如經掩蔽而不明，那種壞處便在暗中存留延長下去，而永久無人改正，一定要弄得一切都沒有進步爲止的。這是一種極大的毛病，我們不可忽略。我們對於既往的歷史，實在應該研究牠，討論牠，對於好的地方，固然不能埋沒，對於壞的地方，尤其不可隱諱，一定要赤裸裸地提出已往所有的弱點來，做日後的鑒戒，使日後有改正的可能，而一切不斷地向前進。我們對於人類全部的歷史，都該如此，何能對於黨的歷史獨異呢？那麼，本黨十三年改組以後的壞處，究竟如何，大家也得和牠的好處同樣注意一下。

本黨自十三年改組以後，黨的統一和整齊的精神，固然比較從前好了，但是同時又有一種不好的現象發生出來，就是自那時改組以後，本黨同志往往以爲黨部的工作爲有直接的權利的，而在黨部做工作的人，對於自己所做的工作，也認爲有權利可享，而不能看做是純粹的義務。在十三年未改組以前，却不如此，大家知道在黨部中做工作都是義務，而且是很困苦，很艱難的義務。那時假使有一個人專在黨部中做工作，專門去盡這種義務而不作別事，

大家凡是知道其中甘苦的人，一定都替黨部稱慶，而不免對他個人憐惜。本黨在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的時代，都是如此。自十三年改組以後，因為黨的精神比較從前好得多，黨的力量，也比較充實些，在黨部做工作的人更加多了，更加雜了，有些都帶着政治上的力量或欲望而來工作，權利的關係因此就發生，而『黨的工作是義務』一個信條，因此便也不明顯了。據兄弟所知，這種情形在當時並不是一方面的，實在是一般的。

我們既知道自己在過去的歷史上有這種情形以後，不妨再將別人的情形，拿來參攷參考。蘇俄共產黨是爲什麼而革命的？他們明明爲着階級的權利，部分的權利，甚至極少數人的權利。他們以爲一個黨不講政治則已，如果講政治，就不能脫離『權利』的關係；而他們所謂權利，終於未曾真正的切實的爲全體國民圖謀，變來變去，總不過是犧牲多數人以成就少數人而已。但是一方面這種爲權利而攪政治，爲權利而革命的錯誤觀念，已深中於一般革命者的心目中，凡在黨裏做工作的人，也懷着權利的思想，甚麼事情都發生於權利的競爭之中，因而他們革命的結果和效能，便一切難言了。他們對於權利的觀念，固然如此，就是

對於成功的觀念，亦復如此。他們甚且把個人的成功，也都擺在革命的成功裏面，於是大家都舍本逐末，認定個人的成功去做，黨內便派別紛歧，爭鬥不已，中央幹部雖常常想許多法子去禁止黨內有派別的暗鬥，但是事實上終於無效，而黨便終於不能統一，革命也終於不能成功。

我們一方面懲前毖後，一方面攻錯他山，馬上就該覺悟到：我們祇要整個的國家民族的權利，而不要任何比這個範圍狹小的權利；我們祇要整個的黨有權威，而絕不容各個黨員有權利思想；我們祇要使全黨全國成功，國民革命成功，而絕不要個人成功。我們既要國民革命成功，便絕對不能有個人的權利思想；我們既是有志去實現三民主義的人，便絕對不能作一毫功利主義的打算。自己過去的短處，是要認清楚了，痛加革除的，不能因為過去自有長處，便予以放任或原諒。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固與蘇俄的不同，而我們的所謂革命，我們的所以革命，也都根本上與蘇俄的兩樣。我們如果對己諱言過失，對人又妄自菲薄，或盲從亂跑，那我們一定是忘記了「總理」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不應該以權利為目的」的兩

句話，而我們將來的一切，也就難言了！

這裏再就近來所謂『惡化』與『腐化』的問題，來說一說權利思想的因果。我們現在已到了根據三民主義去建設的時期，但是我們當前仍有兩條不斷地誘惑我們的歧路——『腐化』與『惡化』——在着。所謂『腐化』和『惡化』的發動，實在是同一個根源——權利思想；而權利思想的根源，又實在是一個『私』字而已。所以『私』簡直是萬惡萬腐的一個總淵源！有權利思想的人，這一頭一定踏在『私』的基礎上，而那一頭一定陷落在『腐』與『惡』的事實之中。全部的腐化與惡化是什麼？無非是對於私人的權利明搶暗奪，軟騙硬取而已。它們彼此實在並無多大的分別，一個人如果腐化了，就不免也要惡化，如果惡化了，同時也不免腐化的。總理生平只揭發一個『天下為公』的道理，僅此一個『公』字，已足以摧破所有『腐』與『惡』的一切而有餘了。凡我同志，尤其是做黨的工作的，勿忘總理『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不應該以權利為目的』的教訓，同時更勿忘總理『天下為公』的教訓，大家先教此心不為權利思想或功利主義所累，然後此身一定也不至為腐化或惡化所染。大

家保存着一副純潔的，偉大的，『犧牲一己，以爲民衆』的心身，才好去領導民衆，完成革命，而實現主義。剛才各位所宣的誓辭之中有絕對要遵守和絕對不能做的幾點，如果『自營爲私』的觀念不能剷除淨盡就不能實踐今日的誓詞，請各位永遠的注意。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六集

## 貫徹始終以求實現 十八年一月廿八日在中央紀念週講

對於時代上不需要的事加以節制，並非消極，正是積極——發揚我們民族固有的文化絕非復古——總理祇教我們去努力，奮鬥，貫徹，實現，並未教我們去討論，講學——講學不是我們織志述事的國民黨黨員應負的責任——我們秉着

總理貫徹始終的精神去求得編遣軍隊的圓滿結果。

各位同志：剛才戴委員已把國軍編遣會議所經過的政治工作，很詳細的報告過了；同時又將他在會議中所留心的事情，就是我們在建設時期中對於軍事應該注意的一點，也和各位很明白的說了。兄弟現在再就他的話，來補充一點。一般聽衆凡是聽了很糊塗的說話，固然易生誤會，就是聽到一番很精闢，很不錯的議論，有時也會發生誤會，這是很奇怪的。我國人以前對於『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觀念，向來牢不可破，以爲無論什麼事情要知道牠是很容易，要做牠總比較困難些。總理覺得這種心理不對，便創造出一種與此相反的學說來

，『行之匪艱，知之維艱』他以為無論甚麼事情，無論知與不知，如果決心去做，那是不難的。他要使人信仰他這種新的學說，會以用錢飲食等等為證，有過詳細的解說，果然大家的意志被他糾正不少。兄弟現在感覺『知』真不容易，因為要求到『知』，非先破除種種誤會不可。一般人總是一面有所知，一面又有所誤會，抵銷下去，還是不知。我們平時聽人家的話，應該把話的本意弄清楚，要記着那些話是在什麼時候說的，是為的什麼問題，話裏面所有的是什麼對象。如果不把這些弄清楚，一定要出自誤謬人，以訛傳訛，而弄出許多笑話來的。及至鬧出笑話以後，在聽的人還以為是說的人誤說，而不知實在是他自己的誤聽啊。

剛才戴委員說：『現在的國軍編遣會議已閉幕了，我們應該按照它的議決案，刻苦去做。凡百國家，經過一次大恐慌或大發展以後，無論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最需要的工作就是設法收縮或節制。現在我們正是需要節制的時候了……』。各位聽了他這話以後，切不要誤解，以為他是抱着保守主義。如果這樣誤解了，那麼第一天還不過責備他不應該說這些保守的話而已，第二天就要因他的話既帶着保守主義，而聯想到他的行為一定也是保

守的；到了第三天，也許就會跑到戴先生那裏，咒罵他是腐化份子了。其實戴先生所說的，何嘗是教大家去抱保守主義呢？他的意思不但不是保守的，而且正是很積極的，兄弟不得不替他趕緊向各位解釋一下。戴先生所謂『要節制』者，是說時代上不需要的一部分應該節制。凡事既有不需要的部分，一定就有需要的部分；有一種不需要的節制，一定就有另一種需要的發展；節制雖是消極，發展却是積極。所以合於時代需要的節制，正是積極的工作。比方現在全國統一了，大家努力建設，多量的軍隊已非時代所需要，所以開國軍編遣會議，以整理全國的軍隊；在軍隊方面說，雖是節制，在革命的進程上，建國的方略上說，却都是積極的進行。這層意思，一經兄弟聲明以後，諒來各位馬上就明白的，毋庸更多辭費了。

再則蔣介石同志在國軍軍官團舉行畢業禮時，曾說：『中國國民革命是根據於 總理給我們的遺訓。 總理的遺訓是什麼呢？就是 總理把古今中外很好的各種理論，聚集起來，結晶成功一個三民主義，以及其他各種的教訓。如果我們遵了 總理的三民主義，而努力力的去做，那麼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可以完成，中華民族才得永存於世界。同時我們不可以說中

國種種的東西都是壞的，外國的都是好的。要知中國也有文化，我們應該要繼承牠，並且發揚光大牠。總理曾告訴我們：『不要忘了我們自己的好東西，無論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或軍事方面的。……』蔣主席這番話實在不錯，但是兄弟已經聽見人家對於他的話有些誤會了。剛才兄弟既替戴先生聲明過，現在不妨再來替蔣先生聲明一下，如果照登廣告的口氣，都可以說是『先此聲明，以免後論』。蔣先生的話又惹起了甚麼誤會呢？前幾天有人向兄弟說：『蔣主席的思想太舊了，仍舊存着「復古」的念頭，教我們去注意舊東西。他從前是那樣的努力打破舊勢力，而現在竟有了復古的思想，真出於意料之外』——這是兄弟親耳聽見的。又有人告訴兄弟說：『好了，我們現在又多出一條研究黨義的道路了』。兄弟當時聽了這話，莫名其妙，不知研究黨義，現在又多了一條什麼路，以為他或者指的是建設革命的一條路。接着他又說：『我們現在可以提倡講學，去研究四書五經，闡明黨義，因為四書五經當中，也有三民主義存在着呢』。兄弟聽了他這話以後，才知道他並不是要做革命建設的工作，而想玩一玩三民主義的古玩而已。他誤解蔣先生的話是這個意思，真是笑話！這不但蔣先生要

給他冤殺，凡是經他這樣宣傳的人，豈不都要走下黑海嗎？各位對於蔣先生那天所說的話，諒都已在報上見過，他的意思是要大家遵照 總理的遺訓，將中國固有的好道德發揚起來，並不是要大家在四書五經中討生活，而找出一本『主義古微』來。 總理的遺囑上不是說得很明顯麼？『共同奮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促其實現』，並沒有叫我們加以討論，或是向四書五經中去找印證，我們何能丟開『貫徹』，『實現』，而去講學討論呢？縱然講學，不犯門戶派別的毛病，兄弟想來也不是急於繼志述事的國民黨黨員現在所應負的責任。

無論做甚麼事情，總要有始有終。我國人向來有一個毛病，就是虎頭蛇尾。對於一件事，起初大家都很努力，非常高興，但是一到後來，大家的精神都衰頹下去，而不肯始終如一，的澈成其事，所以結果毫無。外國人對於一樁事，起初當然就有精神，做到半途，越加有精神，越加高興，所以成績總是一步進一步，直到結果圓滿為止。他們的精神始終不萎靡，而筋力也始終不渙散。我國人無論是辦報，辦學校，辦任何事情，考查起成績來，差不多都是一天不如一天，沒有一天好過一天的，這是民國十幾年來，最壞的現象。 總理教我們貫

徹始終，我們遇事自當秉了 總理這四個字的精神去做，革命才能完成。現在國軍編遣會議已經閉幕了，所有的議決案我們應該一致的使牠完全實現。這個會議雖然閉幕，但是我們對於編遣這件事，自當遵着 總理的遺教——貫徹始終，繼續努力去進行，不得到一個極圓滿的結果不止。所以在該會議閉幕後，馬上成立常務委員會，所有常務委員立刻繼續進行會中的事情，並且不但常務委員要負這重大的責任，即從黨部裏推選出來的委員，而曾經參與該會議的，也要和在大會中列席時一樣的負責。而且在黨的全體黨員，也應該和該會議開會時一樣的大聲疾呼，一樣的督促進行，所謂極圓滿的結果才終有一日可以得到。

# 黨外無政 政外無黨

十八年二月七日在行政院黨義研究會及六區分部講

在訓政期間不但是黨外無黨，並且是黨外無政，政外無黨——黨政間的種種齟齬，都由於黨政雙方人員祇各知道自己一方面，而不能兼顧到對方面——凡是同志，始終只有打成一片，對黨負責，絕不能丟開了黨，而專就政治方面，分出什麼在朝在野來——現在做官的責任太大，不是清慎勤三字所能了事的了！——我們對於 總理的遺教惟有信仰與實行；至於如何才能完全實行，即是我們應該討論研究的—— 總理不僅是我們的理論的 總理而且是我們的實行的總理——所謂信徒的信，不是僅用文字語言所能表示完全的，還要有實行——我們如果一面做政治工作，一面又去認識主義，對於理解的體會必然更真，而實行的效能必然更大——行政人員有實行主義的機會，有實行主義的專責，對於主義，萬不能忽略一點——三民主義就是我國現在最高的倫理，遺囑上所載

的四種遺教，就是我國的先天憲法——現在全國人民的循誦遺囑，不管就是直接發誓，比直接投票還要有力——本黨過去已發表的宣言，不能被人認為不兌

現的支票；尤其是 總理遺囑上所言，我們要亟圖實現。

主席，各位同志：行政院成立數月，各位同志能盡努力，現在於政治和黨務的工作之餘，復成立黨義研究會，悉心研求主義，實在難得。立法院成立較後，目前也想組織這種黨義研究會；既有諸同志的組織在前，我們一切有了參考，是再好沒有的了。所以兄弟今天特來參觀諸同志已有的良好成績，至云演說，實在沒有甚麼足以貢獻的。

諸同志既都服務於黨治下的政府之中，對於黨的一切，應該已經很明瞭了。本黨既然以黨治國，以黨建國，黨與政治，便不能分離，不可分離。我們知道現在全國已在訓政期中，擔負訓政責任的是誰？是黨。黨用什麼來行訓政？用的是主義與政策。因為政治乃完全由黨而來，而黨的主義，也就完全靠政治去實施，所以今後事實上政治如果沒有革命的主義，便不成其為革命的政治，而黨如果沒有革命的政治，便不成其為革命的政黨。政治與黨，既是

一事，而非二事，那麼政府中同志，在政治上所擔負的一切工作，當然就是黨所給與的；而今後政府一切施政的標準對與不對，首先就該問到是否遵照黨的主義了。由此看來，方今全國統一，訓政開始，不但應該說『黨外無黨』，並且應該說『黨外無政，政外無黨』啊。

兄弟每每看見在中央擔任政治工作的人，對於黨事，還有不明瞭的，各省的黨務人員，對於政治，也常有同樣的狀態。這是什麼緣故？因為做黨務工作的人，每以辦黨自限；做政治工作的人，又每以行政自限；彼此劃了界線，分了畛域，久而久之，彼此間便發生了裂痕，甚至弄到彼此不相容的地步。行政者每每倚仗他們有政治能力，地位，與經驗，而輕視辦黨者為能力薄弱，經驗缺乏，對他們一舉一動，總是吹毛求疵，不以為『惡化』，即以為『近惡化』。辦黨者又每每恨行政者一切措施緩慢，遇事猶豫，甚至不恤與情，尤其恨他們不容納黨部的意見，不聽黨部的指揮，對他們一舉一動，也是吹毛求疵，不以為『腐化』，即以為『近腐化』。如此你說我惡化，我說你腐化。起初彼此意見各不相下，既而遇事彼此各不相謀，到了後來，便彼此在地位上各不相容了。而追究起根源來，還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緣故

。所以單就行政人員方面來說，無論中央的與各省的，都不免有只知政情，而不能兼知黨義的人，這是政與黨之間種種齟齬的一個大病根。要免除此病根，惟有先自兼在黨政兩方面的人，絲毫不分畛域，彼此切實認識始。

兄弟又常見在野者對於在朝者，攻擊得不遺餘力，甚至用從前大家一同攻擊敵人的手段來攻擊同黨中在朝的人，以為不如此不足以證明他們的氣節之盛與政策之高。而在朝者又未免以為現在既是建設時代，凡是偏重破壞的工作，已用不着，無論何事，均以穩健慎密出之，對於在野者遇事太積極，倡論太高的，每慮其為『惡化』或『準惡化』；這樣一來，就和黨政間的人員犯了同一個毛病了。其實既屬同黨，即是為主義相同而結合，以領導革命為責志，無論此身在何種地位，祇要黨籍未除，總有着一種領導革命的責任在肩上，雖因一時所處的地位不同所激的各方面的工作不同，那是沒有關係的。大家既屬同志，何能有一個時候丟開黨說話，而專門就政治方面，分別出什麼『在朝』『在野』來呢？倘若因為其人正在政治上活動，便祇認他是官，而抹殺掉他同時所有的黨的關係，無形中把政治推到黨以外去，那

尤其不通了。中國向來所謂官僚，與外國的所謂官僚不好之處，在呆呆板板的做事，而不肯於法定時間，法定範圍，法定手續以外，多做一點點，或活做一點點；中國的官僚主義，則惟有借政治上不正當的活動，去陞官發財而已。就政治的效能上說，外國的官僚主義尚且不可，何況中國的官僚主義呢？在一般政治中做官的人，尚且不甘於抱官僚主義，何況在三民主義政治之下服官的人呢？如果因為某人在朝，便說他是專門在那裏做官，又因為他做官，便說他一定抱的是官僚主義，而濫施攻擊，試問妥當不妥當呢？至於我國向來以『清』『慎』『勤』三字為居官的要訣，兄弟以為實在還不夠。便算做到這三個字，至多也不過能夠寧人息事，居常守法，不抱中國的官僚主義而已，未必連外國的官僚主義也脫離了。僅能機械式的做點死了而已，那豈是現在國民政府所企求的官吏嗎？訓政時期的官吏，責任實在太大，所以如果專用此三字為服官的要訣，還是不夠。這一層大家也不可以不體會到。

我們既常常讀 總理遺囑，就該知道我們無論行政辦黨，所應遵循的途徑為如何了。

總理遺囑上說：『必須……共同奮鬥，務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尤須……促其實現，』無一句話不是肯定，斷定，決定的。總理明明白白的只教我們照他所定的主義和政策去努力實行，並沒有教我們去研究或討論。如果我們不去切實奉行，而仍去研究討論，那豈算得是 總理的信徒呢？既是 總理的信徒，對於 總理已定的種種遺教，就該完全懂得，而且絕對信仰。如果因為不相信，因為懷疑，而去研究討論，或因為不明白，不了解，而去研究討論，那都未免太滑稽了。然則我們現在組織黨義研究會做什麼？到底應該研究些什麼呢？兄弟以為 總理已定的主義政策，是無庸研究，不必討論的；至於主義如何實現，政策如何推行，却是我們要研究的了。我們就現在的政府與人民，國內與國外的情形看去，一面是 總理已經計劃的，高遠的，完美的主義與政策，一面是我國現實的人民社會，和最近所處的國際地位，這兩面雖不能說是兩極端，但其中距離却還很遠，如何把這一面可以實現的理想與計劃，完全向那一面國內與國外的實際上實現起來，這就是我們應該研究應該討論的了。

總理說：『行之匪艱，知之維艱，』所謂『知難行易』是也。我們對於 總理的主義政策，既然認識與信仰了，就是對於這些已經『知』了。既知以後，如果決心去『行』，那一定是容易的，我們不必畏難苟安。大家更須知道：理論與實行是一件事，我們的 總理，不但是從理論一方面創建三民主義的人，而且是及身自己去實行三民主義的人。他不僅是我們的一個理論的 總理，而且是我們的一個實行的 總理。俄國布哈林以爲布爾希維克的理論是理論，實行是實行，所以他作列寧的小傳，分爲理論之部，與實行之部，實在大錯！理論和實行實在是不可分的。惟其不可分以後，才能得到理論上深刻的剖解，和實行上精確的成就。

。 總理的三民主義，絕不和從前的四書五經一樣，祇要人讀讀，曉得就算了的，重在要人去實行。譬如一個小孩子，何嘗不可以熟讀三民主義，何嘗不可以明白三民主義，但是他熟讀與明白以後，並不能實行，那他還不能就算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所謂『信徒』的『信』，要用行爲與實現來表示，不是僅僅用思想和言語文字就能表示完全的。 總理留給我們的教訓是些什麼，我們就去實現些甚麼，那才配稱做『總理的信徒』呢。

至於實行之時，又應該如何的應用理論呢？譬如行軍，必須用地圖；譬如航海，必須用羅盤。理論就是我們實行時的地圖或羅盤而已。我們在行政機關服務，一面做工作，一面還要將手裏所做的，隨時去和心上所想的理論對照對照。如果祇談理論，不求實行，固屬空想；若隨意亂做，不顧理論，那麼盲人瞎馬，夜半深他，前途是何等的危險呢！況且惟其是有理論的人，惟其是常常顧到理論的人，在實行之中，才有更進一步的真實的體認，才能得着更進一步的真實的效能。譬如我們伴着一個普通的人出去遊玩，其人在客觀上所注意的，無論對人對物，一定都平平淡淡，無甚精微獨到之處；但我們如果伴着一個美術家同遊，同一人同一物，他所注意的，所觀感的，一定比平常更進一步，而遊玩的樂趣，一定也跟着增進一步了。何以如此的呢？就是因為他有理論，有較高的主觀，所以對於客觀，便也有了較真較實的感覺。美術家如此，科學家亦然，政治家又何獨不然？在應付政治方面千頭萬緒的客觀之中，一個有主觀的政治家，和一個沒有主觀的比較起來，成效相差得遠了。更如我們在未曾向政治上努力以前，對於 總理的主義，印象或許不深刻，認識或許不透澈，一旦我

們已經實行政治工作了，將 總理的主義政策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再考量考量看，當然比較深刻，而認識也當然比較透澈，實行也當然比較容易了。所以我們如果一面做政治工作，一面又去認識主義，對於理解的體會固然真確，對於實行的效能也就增進，這是敢斷言的。古人爲什麼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呢？也就是這個道理啊。

我國四萬萬人當中，現在最少應該有三萬多萬人是不反對三民主義的了。但從積極方面看，真正認識三民主義的人能有幾何？進一步能身體力行，百折不撓的人，又能有幾何？這就實在難言了。有些人說，他們末嘗不想實行三民主義，無奈沒有機會，沒有權力，這句話是又當別論的；至於我們現在，既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實行主義的機會，又有實行主義的專責，還有什麼話可以推託？如果再不由我們手裏，將主義實現到事業上去，那真對不起總理，對不起四萬萬國民，並且對不起自己了。但是如果拋開理論，我們雖十分努力，又能夠實現些什麼？而我們的專責，又怎麼能負呢？我們想到這一層以後，應該格外警惕，對於理論——主義和政策，今後格外不能忽略一點點了。這是兄弟特地提出來，請諸位再三致意

的。

世界上的政治，無非法治與人治兩種。外國講法治，我國講人治。法律既定，便可依照施行，所以法治易有標準。至於人治，自然以人爲本體，一切標準，就要靠人的公共行爲來做規範，所謂『名教』，所謂『倫理』是也。這種最高倫理，既是人治的一切標準，所以法在其下，人亦在其下。本來這種標準，不但人治爲然，法治亦然。凡法治的國家，遇事有法的依法，無法的依習慣，以濟法律之窮。但什麼是好習慣，什麼是惡習慣，又全賴道德宗教去決定，就是賴倫理去決定了。現在中國的倫理如何？我們可以說，三民主義就是中國現在最高的倫理，總理的遺教就是中國的先天憲法。也可以說 總理遺囑上所說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是中國的不成文的憲法。這些既是先天憲法，與最高倫理，可見我們對它祇有服從遵守，努力實行，更無一點懷疑或變更的餘地了。中國爲倫理的國家，一切的支配，以倫理爲最高原則。從前居我國最高倫理的地位的是孔子；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爲，受孔子學說的支配的最大。現在居我國最高倫理地位乃

總理，他集合中外的文化思想，融冶於一爐，又常常站在時代的前面，所以能把我國數千年來所遺傳的思想，完全放在他的思想之下。昔日的孔子祇是憲章文武，儀範百王而已，今日的總理才真可謂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呢。

總理的學術思想，不但在人格上，道德上，已取得全國最高倫理的地位；同時在法律上，事實上，也可算取得全國最高憲法的地位了。何以言之？我們知道民權最發達最進步的辦法，是人民直接投票，而直接投票的表示，還不如直接發誓的表示來得切實。現在全國人民大多數已對着 總理的遺囑發誓了。總理說要『必須』怎樣，我們也就服從他『必須』怎樣；

總理說要『務須』怎樣，我們也就服從他『務須』怎樣；總理說要『尤須』怎樣，我們也就服從他『尤須』怎樣。這種發誓式的承認與服從，比較直接投票，簡直更進一步了。再則我們現在既有了 總理的全部遺教為最高倫理，我們當然已得到人治中的一切標準，而一般人還顧慮到一件事，就是新舊文化的衝突，有人說新的不好，有人說舊的太壞，到底誰好誰壞，以為還是漫無標準。其實在我國文化中，那些是好的，要保存，要發揚光大，那些是壞的，要

廢除，要改革禁止，總理遺著上早已告訴我們了。不獨此也，連現在物質科學應該如何前進，精神思想，應該如何發展，總理也都很清楚很詳細的告訴我們了。我們只要信仰他的話去做，那裏還有什麼新舊文化的衝突不能解決呢？

我國現在還是民權未能實現之時，代行政權者爲黨；黨有主義，有政綱，政府遵照黨的主義政綱去實行，就是尊重民意，否則就是違反民意，就稱不起爲『國民政府。』同時黨在它的實現主義與推行政綱之中，又該切合民情，定出緩急輕重來，逐步的去做，以不負它的代行政權。當軍事方終，建設開始之時，人民懲前毖後，心理上的要求，一定很大。有許多事不是馬上就能做的，尤其有許多事馬上雖可以做，而不是馬上就有成績可言的。人民的要求既大，如果各方面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很容易失望；如果教他們錯覺到失望以後，我們的事便更難辦了。何況我們從前總是本着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對人民發了許多的宣言，現在如果既不能處處滿足人民的要求，又不能自己實踐自己以前所說的話，卽就格外爲人民所不許，大家都要說我們國民黨是常發不兌現的支票的了。對於別種大小支票一時不能兌現還當別

論，如果我們自己天天宣讀的遺囑，人民跟着天天發誓似的所讀的『必須』、『務須』、『尤須』種種，亦復不能實行，不能兌現，那如何說得過去呢？兄弟覺得諸同志於行政工作百忙之中，猶能共同研究黨義的如何實行推進，一面顧理論，一面做工作，既可於理論中求諸實行，又可於實行中認真理論，是最美滿的辦法。今天僅就總理遺囑所有的意義，反復敷陳一點意見，以供採擇，遠望大家共同研究。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 完全廢除陰歷是總理的遺教

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

觀於社會上過陰歷年的人仍然很多，就該知道我們的訓政要趕緊推進——陰歷難於廢除的兩種原因——商業上有所謂年關，家庭中有各種迷信——廢除陰歷的辦法，要由我們自身和我們的家庭做起——革命者是社會的骨幹，應去轉移社會，不應被社會所轉移——廢除陰歷，全用陰歷，是總理的遺教，我們應該去實現的——我們應該把過去的革命工作，和未來的計劃，向第三次代表大會作詳細的報告——我們應該在這次代表大會中，使全國的人民從此都認識本黨，信託本黨——

今天舉行紀念週，剛是舊歷新年的元月初二，我們不覺有一種感想。民國元年，政府即命令全國，改用陽歷了，而十餘年來，社會上一般人對於陽歷的好處，還是不很明瞭，事實上還是丟不開陰歷；去年國民政府曾經再下命令，廢除陰歷，全用陽歷，而這兩天社會上過

陰歷年的人，還是很多；足見社會的頑固，遇事不易改革，凡我們擔負訓政責任，正做訓政工作的人，應該看到，應該格外努力設法，把訓政推進到這樣亟待啓迪，亟待訓練的民間去，化除了社會上一切的頑固，而拓展國家一切新的建設。

陰歷所以難於廢除，有兩種原因，我們既有志打破社會上這種習慣，便不得不查明它的原因，而分別去着手進行。社會上沿用陰歷最力的是商家，商家向來都是年底結賬，以爲結過了賬，才另是一年。商人是比較沒有什麼活動的思想，和革新的精神的；但他們的事業，却是與社會組織有關係，陰歷的存在和應用，響來有他們保着險，而社會上與他們發生密切關係的人又極多，於是這些人連帶着也與陰歷發生了關係，而陰歷就此根深蒂固，不容易打破了。這是陰歷難廢的第一個原因。再有一般迷信的人，心裏總記掛着許多竈神，財神，天神地主等等，都在陰歷歲除的前後，等待他們按着一定的時日，去接送，禱祝，酬謝。這些事情，在他們以爲是與來年的幸運，有莫大的關係，非常重要的；而那些時日，如果移轉到陽歷上去，他們又覺得不準確，不恭敬，所以陽歷年雖然過了，這些事情都不肯做，終要再

過一個陰歷年，去完成那一件一件事，他們心上才安適。這是陰歷難廢的第二個原因。

兄弟覺得這兩個原因，去打破沿用陰歷的習慣，却有一個共同的發腳點，就是從我們革命者的自身做起。因為商業雖是與社會組織有關聯但是它的作用，並不在乎沿用甚麼一定的歷。凡是革命者對於這一點，如果決心不和一般社會上人相同，不被它所轉移，而倒過來一齊去努力轉移它，單單商界也保持不住陰歷的。我們只要把所有的賬目，在一年以內，分期和他們結清，不積聚到任何的年底去；我們既另有結賬的時期，對於他們所定的陰歷年底結賬一層，就可以不理了。此外凡是舊習慣定在陰歷年底一個短時期內所做的事，我們通通把它分派到一年以內，平常許多時期去做，打破向來的所謂『年關』。如此在根本上移轉了社會間陰歷年的重要作用，陰歷自然難於立足了。這樣辦法，不但促進了陰歷的廢除，並且可以養成我們凡事都有相當準備的習慣，使我們的生活格外有條理，格外紀律化，科學化，不至於像以前那樣，凡事平時只管擱置，壓積，拖欠，放弛，直到年底，才不自然地，過分地緊張一下，於事情的效能上，如果精密考查起來，總是有損無益的。

再說到破除迷信一層，更非從我們本身，與我們的家庭，先來做個模範不可。我們應把社會上一切的事情，和我們平日生活中一切的表演，通通就我們革命的目的所在，細細考量一下，凡是在革命目的上認為不合的，無謂的，當然在廢除之列。經過這種選擇與淘汰之後，陰歷歲除前後的種種迷信舉動，還有存在的餘地嗎？而在所謂廢除中，我們更應該合於革命的政策，分別出輕重緩急來，逐漸進行，並且應用革命的精神，對於不良的習慣與環境，絲毫不妥協，不屈服。我們自身如此，我們的家庭如此，我們的宣傳不斷的如此，社會自然會被轉移過來的。最怕革命者不把自身向革命的道路上集合成一個總的大力量，去轉移社會，反而讓各個自身給社會的各部分吸收了去，甘心受它們的包圍和同化，而為它們所轉移，那就糟了。那豈但社會的迷信不易革除，陰歷不易廢止，如此容易失却革命性，並且是革命者的一個莫大的危機啊！

總之：廢除陰歷，是一個社會問題。以前我國的社會，好像是一堆肉，只管攤在那裏，立不起來，做不了什麼事，什麼都只好歸結到這三個字上來：『沒辦法。』現在社會上有了我

們全體的革命同志，社會的組織與前不同了，真好比一堆肉裏，生長了全部的筋骨，覺得起來，動得起來了，任何的困難事情，一經努力奮鬥，總可以把從前的『沒辦法』三個字，換成『有辦法』三個字的。這種骨幹筋絡，直要把我們的整個民族，擦豎到自由平等的國際地位上去，區區一個陰歷的習慣，算得甚麼！有何不能打破？不過我們如果各自忽略了自身年年去責備社會，而就要追求那些所謂骨幹的作用，領導的作用，革命的作用，那是追求不着的。

總理曾經說過：『革命要先革心。』凡事須從各人方寸上正起，也就是要從各人自身正起，何況我們今後正要去訓練人民，領導人民，如何可以沒有『以身作則』的一層作用呢？

總理也曾說過：『陰歷在我國雖然行了很久，但它是數千年帝制的遺跡。革命以後，既改爲民國，這種遺跡，當然在廢除之列。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應該完全應用民國的新歷。』這件事比較起來，雖然很小，但既是 總理的遺教所在，我們也應得努力去做的。假如今後社會上有了我們，一切仍和以前沒有我們一樣，人民的迷信依然不見減少，陽歷的應用依然不見普遍，那我們訓政的工夫還沒有到，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說來，今後社會上一年一度的

陰歷過年狀況如何，不啻就是明明白白的在那裏報告我們訓政中一部分的成績如何，大家同志不可以不注意啊。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期近了。我們打算在大會之中，把黨內過去工作的歷史，和現在工作的情形，一一報告一下。所以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掃除一切革命障礙起，直到最近統一全國，依照 總理的政策，試立五院，實行訓政爲止，其中種種經過，種種事實，都應該開始審查，編造報告。我們立法院過去的工作，和未來的計劃，當然也要整理出一個報告來，提到政治會議去，彙總向大會報告，這件事是我們目前急於要辦的。前幾天政治會議裏對於這件事已有了決議，本院秘書處也會通知過各委員會了，希望各委員會趕快編造報告，勿誤時限。我們要知道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於今後完成革命的前途，關係非常重大。前幾天蔣主席對於這一點所發表的意見，兄弟全部贊同。本來我們的黨完全是以 總理的主義爲中心，我們應該向着這個中心，把全國國民領導到建設之路去。第一第二兩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那時革命的勢力尙未及於全國，本黨也未能得全國人民的認識與信仰

；至於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我們一定要使全國的人都認識本黨的主義和政策，並且都信託本黨，去進行一切了。在所謂認識與信仰之中，簡直要全國的人都承認 總理的全部遺教，不啻就是我國約法憲法的最高原則，不啻就是我國的先天憲法，不成文的憲法。今後全國就得一致的遵奉這種憲法，去建設國家，治理國家。這一層也要由這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來，使中外人士感知的，兄弟先略報告一下。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六集

一四四



3  
13  
36

## 增訂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戴季陶著

全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思想界的紛亂極了，中國國家的社會的危機逼緊了，怎樣救中國國家的社會危機，請看這一部書！

全書經戴先生自己校正過，並增加了四分之一。看過第一版的，務必

請看第二版。

## 工會條例釋義

定價五分

現在勞工運動一天發展一天各勞工團體都感覺到工會條例的必要。這工會條例，是十三年十一月間孫大元帥正式公佈過的，現經邵元冲先生逐條加以簡明解釋，刊印成冊，以供一般勞動組織者的研究。

## 反科學的馬克斯主義

郭任遠著 定價六角

本書係從科學的立場，研究馬克斯主義，用筆非常鋒利。關於馬克斯主義之不合心理學及生理學兩章，尤反覆討論，因著者係心理學專家，故其立論之精銳，尤爲他書所莫及。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新經濟學

德國盧森堡著 陳壽僧譯

胡漢民校訂 平裝定價一元二角  
精裝定價一元五角

盧森堡是爲世界革命犧牲的偉人，又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第一流底學者。其見解之精銳，可以說是當世無敵。此書以推翻近代一切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而建設牠的新經濟學爲特色。同時給社會革命勞動運動以真正科學的基礎。陳壽僧先生從日文譯出併對照德文原本，又經胡漢民先生校訂，力求信達，斷然爲中國出版界第一本經濟學書。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出版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六集

(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演講者 胡 漢 民

發行者 民 智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至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 智 書 局

南京 武昌 漢口

廣州 杭州

發(一五六四)

